

唐五代時期之成都

嚴耕望

目次

引言

- 一、中古時代成都發展史概觀
 - 二、唐代成都府在全國政治軍事上之地位
 - 三、城郭與公署
 - 四、坊市與四季市集
 - 五、工業與商業
 - 六、寺觀與佛道兩教
 - 七、文學藝術與民風
 - 八、都市戶口數額畧測
- 唐五代成都城郭江流示意圖

引言

中國疆土自秦嶺以南、三峽以西之西南地區，爲山岳地帶，山峻谷深；惟成都盆地爲唯一廣大平原，加以氣候溫和，物產豐富，故成都地理形勢上爲中國西南部縱橫數千里間之天然的交通、經濟中心，亦爲見史以來，中國西南部最重要且恆久性之政治軍事中心。

就政治軍事言，自古代蜀國建都於此，秦滅蜀，置成都縣，並置蜀郡。漢置益州，察巴、蜀諸郡，本治廣漢郡之雒縣，漢末劉焉爲益州牧，遷治成都，自後歷代皆爲益州刺史治所。隋文帝廢郡，以州統縣。唐玄宗幸蜀，升益州爲成都府，以迄近代，皆爲中國西南部廣大地區之最大政治軍事重鎮。蓋自然地理形勢特殊，自然形勢不變，軍政形勢亦難變。

就經濟言，成都自秦惠王時代，築城置市，與咸陽同制，遂爲中國西南最重要都市。西漢末年躋升爲長安以外全國五大經濟都市之一。其後成都一直保持其重要都市之地位，且爲中國歷史上極少數幾個歷二千年繁榮不衰都市之一。蓋蜀中既地勢平坦，物產豐盛，西南邊徼內外諸少數民族皆仰成都爲物資集散地，故蜀中自古具有經濟繁榮之優越

條件。加以去關中不遠，地既富庶，而四境阻險，關中有變，士庶避地，首趨蜀中，此亦增加經濟繁榮、文化發達之一背景也。

唐都長安，承平時代，仰蜀中為物資供應之府庫，亦恃蜀中為西南之屏障。關中有事，皇室士庶恆恃蜀中為退避之所。且安史亂後，吐蕃勢力，直逼隴東，長安已在其軍力威脅之下，惟賴朔方諸軍之蔽拒，與劍南一軍之犄角，始得支持百有餘年。蜀中在唐代政治軍事上之地位如此重要，加以人口衆多，經濟繁榮，人文蔚盛，故唐代中葉，成都已與揚州並稱為首都長安以外之兩個最大都市。當時雖有「揚一益二」之言；實則揚州之盛，僅以地當南北水運樞紐，故商業最為發達，過客亦最衆多；若就政治軍事之地位與農業、工業、宗教、文藝，乃至管絃、樂舞諸端綜合觀之，成都決不在揚州之下，盧求《成都記》強調成都之地位，誠非虛妄。

唐末黃巢之亂以後，長安殘破，而蜀中安定如恆，關中士庶入蜀者益多。至五代時期，兩蜀割據，無供應中原之負擔，故物力更見雄厚，促成經濟文藝又進一步之發展，達到成都在中國史上之巔峯時代。而揚州自唐末以來屢經戰亂破壞，且國家分裂為數個政權，各據一方，南北交通受阻，運河亦就淤壞，揚州自失其全國性南北交通樞紐之優勢地位，以致市容大不如前。故唐末五代時期，成都不但為當時中國第一大都市，亦且為當時中國文學藝術之最大中心。蓋就某一端而言，南唐之金陵，吳越之錢塘，或可角勝；但統體言之，皆絕難比肩也。是以黃休復《益州名畫錄》所錄固盡蜀人或中原流寓蜀中者，趙崇祚《花間集》所集亦蜀人或寓蜀者為多，且如宗教氣氛之濃厚，珍奇服飾之富麗，四時遊樂之侈縱，管絃樂舞之沉迷，乃至妓樂美艷，宋初人君仍有「蜀婦人多美慧」之言，而中國印刷術之發展，論地方之興盛，亦自蜀中始。凡此諸端，皆非偶然。但史家對於成都之此一形像，並無認識，故畧徵史料，述之於次，聊備治史者之參考。

一、中古時代成都發展史概觀

成都平原之自然地理形勢特殊，必然成為中國西南部之政治經濟中心，前於引言中已畧述之。故自古代蜀國統治整個成都平原，殆已為中國西南數千里間國土最大、經濟文化最發達之國家。〔1〕至秦惠王滅蜀，亦視為控制西南廣大地區之核心區域，故大築成都城郭，如咸陽之制。〔2〕然史公《貨殖傳》述巴蜀物產之饒，但尚未稱成都為「一都之會」，《鹽鐵論》亦未列入「天下名都」。〔3〕至西漢末年，蜀郡已為全國人口稠密地區之一，成都一縣著籍民戶七萬六千餘，僅次於長安，〔4〕加以工商發達，已得與洛陽、邯鄲、臨淄、宛並列為天下五都〔5〕為當時長江流域唯一之第一等大都市。足見此城在西漢後期發展之迅速。故揚雄有《蜀都賦》之作，〔6〕至晉左思復作《蜀都賦》，形容成都之盛況尤詳。〔7〕

〔1〕《華陽國志》三《蜀志》。參看童恩正《古代的巴蜀》第六、七章。（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

- [2] 《華陽國志》三《蜀志》及《寰宇記》七二益州成都縣目引揚雄《蜀本紀》。
- [3] 《鹽鐵論校注》卷一《通有篇》第三：「大夫曰，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溫、軹，韓之滎陽，齊之臨淄，楚之宛、陳，鄭之陽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內，皆為天下名都。」此見史公稍後，昭帝時代，成都尚未為第一等大都市。
- [4] 《漢書·地理志》，各郡皆著戶數，而縣著戶數者則極少，蓋皆戶口特多之縣也。比較著戶之縣，長安縣八萬八百戶，為最多；成都縣七萬六千餘戶，次之。其他各縣，不踰六萬戶。
- [5] 《漢書》二四《食貨志》下。
- [6] 揚雄《蜀都賦》收入《全漢文》五一。
- [7] 左思《蜀都賦》收入《文選》四，參劉注。

南朝劉宋初年，「遠方商人多至蜀土，資貨或有直數百萬者。」〔1〕梁世蕭紀為刺史，以胡商主財貨，「外通商賈遠方之利」，聚黃金至萬斤，他物稱是。〔2〕可畧測其繁榮之狀況。《南齊書·州郡志》云，成都「西通芮芮、河南，亦漢武威、張掖為西域之道也。」，「州土瓌富，西方之一都會焉。」是也。〔3〕

〔1〕《宋書》四五《劉粹傳》附《道濟傳》，引詳下文第五節。

〔2〕《南史》五三《梁武陵王紀傳》，亦引詳下文第五節。

〔3〕《隋地志》上，稱蜀郡「其地四塞，山川重阻，水陸所湊，貨殖所萃，蓋一都會也。」實以成都為中心。

隋以前，蜀郡、益州之治所皆僅置成都一縣，此郡縣制度之通例也。唐初貞觀時代，劃成都東半，增置蜀縣，後改華陽，故附郭有兩縣，〔1〕蓋以戶口之衆多，已見成都城又有進一步之發展。至武后時代，陳子昂云，「蜀為西南一都會，國家之寶庫，天下珍寶聚出其中。又人富粟多，順江而下，可以兼濟中國。」〔2〕又云「國家富有巴、蜀，是天府之藏，自隴右及河西諸州，軍國所資，郵驛所給，商旅莫不皆取於蜀。又京都府庫，歲月珍貢，尚在其外。此誠蜀，國之珍府。」〔3〕是其時蜀地對於中央財政與西北軍儲已皆有極大之供輸作用，殆僅次於黃河南北與江淮兩地區也。

〔1〕參看《元和志》三一成都府目，《寰宇記》七二益州目。

〔2〕陳子昂《諫雅州討生羌書》（全唐文二一二）。

〔3〕陳子昂《上蜀川軍事》（全唐文二一一）

安史亂後，河南、河北、河東三道殘破，江、淮轉輸亦時見阻絕，惟劍南物產繁富，交通無阻，故杜翁至云，「瓊林諸庫仰給最多」，〔1〕且其時西北大幅疆土已失，唐蕃國界近在京西不過五百里，故劍南在邊疆防護與京師拱衛上之地位益見重要；〔2〕加以工商發達，社會繁榮；劍南道成都府於全國諸道府中，遂躍居於極顯著之地位。故《元和志》云，揚州與成都府「號為天下繁侈，故稱揚、益」，〔3〕以與當時商業最繁榮之揚州並列也。至大中九年，盧求作《成都記序》更詳之云：

「大凡今之推名鎮為天下第一者曰揚、益。以揚為首，蓋聲勢也。人物繁盛，悉皆土著，羅錦之麗，管絃歌舞之多，伎巧百工之富，其人勇且讓，其地腴以善熟，較其

要妙，揚不足以侔其半；況赤府畿縣，與秦洛並，故非上將賢相殊勳重德……爲人所歸伏者，則不得居此；況控帶蠻落，阨戎限羌，非文武寬猛，則不能得中庸；以是聖庭慎擇，尤難其任。」〔4〕

是當時一般認爲揚、益皆爲天下第一等繁榮城市，而益較揚爲次。宋人云，「唐世諺稱揚一、益二，謂天下之盛，揚爲一，而蜀次之。」殆有所本。〔5〕至於盧《序》有揚益抑揚之言，雖爲成都作記，不得不然；但揚州之盛主要以交通商業爲背景，而盧氏所陳，乃就農業、工業、樂舞與政治、軍事地位而言。核實各點，亦非侈談也。

〔1〕杜翁《爲閬州王使君進論巴蜀安危表》云：「河南、河北貢賦未入，江、淮轉輸，異於曩時；惟蜀劍南，自用兵以來，稅歛則殷，部領不絕，瓊林諸庫仰給最多。是蜀之土地膏腴，物產繁富，足以供王命也。」（全唐文三五九）

〔2〕詳後文第二節「成都府在全國政治軍事上之地位」。

〔3〕《輿地紀勝》三七揚州卷《風俗形勝目》引《元和志》，「揚州與成都號爲天下繁侈」云云。按今本《元和志》揚州卷已佚。

〔4〕盧《序》收入《全唐文》七四四。

〔5〕《容齋隨筆》九《唐揚州之盛》條云：「唐世鹽鐵轉運使在揚州，盡幹利權，判官多至數十人，商賈如織，故諺稱揚一益二」云云。此爲時人所慣引之一條史料，實則「揚一益二」之說，至少可上溯到唐中葉之《元和志》與唐後期之盧求《記》，具見前引。

唐末黃巢之亂，僖宗幸蜀，關中士庶大量避亂，流徙劍南，〔1〕更促進蜀中經濟之繁榮，文化之發展。繼而兩蜀割據，爲偏霸政權，物資珍玩不貢中原。〔2〕加以在相當一段時間內無大規模之軍事行動，故蜀中更顯富庶繁榮。蜀人本好逸樂，生活奢侈，至此，君主士庶，服飾麗華，奢靡益甚，雖「村落閭巷之間，絃管歌聲，合筵社會，晝夜相接。」〔3〕至蜀外人士有企羨矚目，與伐取之謀者。〔4〕綜觀五代十國各地情形，成都當爲全中國最繁榮之第一大都市，長安、揚州已衰，五代都城之開封、洛陽，南方盛國之金陵、錢塘殆更非其比矣。

〔1〕自古關中、中原有亂，蜀中爲士庶避徙地之一，此見於漢世黃巾之亂與西晉永嘉之亂，前人論之詳矣。今即就隋、唐事例畧加徵述。如《續高僧傳》四《玄奘傳》云，「四方多難，總歸綿、益。」此隋末之亂也。高適《請罷東川節度使疏》（全唐文三五七）云：「比日關中米貴，而衣冠庶士頗亦出城，山南、劍南道路相望，村坊市肆，與人雜居。」此安史亂後也。唐末因黃巢之亂，士庶避地入蜀者，《北夢瑣言》等書記之甚多，即就《益州名畫錄》所記畫家計之，避地而來者已不少，《蜀橋樑》上，所記前蜀諸臣，大多爲北人。《通鑑》二六六梁開平元年紀云：「蜀主（王建）雖目不知書，好與書生談論，粗曉其理。是時，唐衣冠之族多避亂在蜀，蜀主禮而用之，使修舉故事，故其典章文物有唐之遺風。」長安衣冠盡投蜀中，對於蜀中制度之修舉，經濟文化之發展，必然要發生積極之作用。

〔2〕《通鑑》二七三後唐同光二年紀：「初帝因（李）嚴入蜀，令以馬市宮中珍玩。而蜀法禁錦綺珍奇，不得入中國。其粗惡者乃能入中國，謂之入草物。」胡《注》：「自盛唐以來，蜀貢賦歲至京師。此法乃王衍之法也。」又《蜀橋樑》下，後蜀廣政十三年條：「是時，蜀中久安，……府庫之積，無一絲一粒入于中原，所以財幣充實。」

〔3〕兩蜀繁富，材料可參考者甚多，茲列數條如次：

《新五代史》六三《前蜀世家》：「（唐）莊宗遣李嚴聘蜀，……蜀都庶士簾帷珠翠，夾道不絕。嚴見其人物富盛……歸乃獻策伐蜀。」

《新五代史》二四《郭崇韜傳》：「莊宗聞破蜀，遣宦官向延嗣勞軍。……延嗣還，上蜀簿，得兵三十萬，（《舊五代史》三三莊宗記，脫「十」字。）馬九千五百匹，兵器七百萬，糧二（舊記作三）百五十三萬石，錢一百九十萬緡，金銀二十二萬兩，珠玉犀象二萬，文錦綾羅五十萬匹。莊宗曰，人言蜀天下之富國也。所得止於此邪？延嗣因言蜀之寶貨皆入崇韜。」又《通鑑》二七四同光三年記，延嗣曰：「聞蜀破，其珍貨皆入於崇韜父子，崇韜有金萬兩，銀四十萬兩，錢百萬緡，名馬千匹，他物稱是；延嗣所取復在其外。」按延嗣所上蜀簿已不少，惟莊宗太奢望，亦蜀富盛之名太高耳。於至延嗣言崇韜所得，多半諛詞。又《新五代史》六四《後蜀世家》：「魏王（繼宏）之班師也，知祥率成都富人及王氏故臣家，得錢六百萬緡以犒軍，其餘者猶二百萬。」此八百萬則蜀簿之餘也。

《五國故事》上：「（王）衍……嘗以綵綾數萬段結爲綵樓山，上立宮殿亭閣，一如居常棟宇之制，衍宴樂其中，或餘旬不下。」「衍好燒香沈檀蘭麝之類，芬馥氤氳，晝夜不息；既而厭之，乃取阜角燒之。其奢縱皆此類也。」「調享之日，蜀中士女夾道觀之，珠翠簾幕，爲之照耀。」

《蜀檣杙》上，前蜀王衍乾德五年，「四月，遊浣花溪，龍舟綵舫，十里繚互，自百花潭至萬里橋，遊人士女珠翠夾岸。正午暴風起，須臾雷電冥晦，……溺死者數千人。」

《蜀檣杙》下，後蜀孟昶廣政十二年「八月，昶遊浣花溪。時蜀中百姓富庶，夾江皆創亭榭。游賞之處，都人士女，傾城游玩，珠翠綺羅名花異香，馥郁森列。昶御龍舟觀水嬉，上下十里，人望之如神仙之境。昶曰，曲江金殿鎖千人[門]，殊未及此。」

同上廣政十三年，「九月，令城上植芙蓉，盡以幃幙遮護。是時蜀中久安，賦役俱省，斗米三錢。城中之人，子弟不識稻麥之苗，以笋芋俱生于林木之上，蓋未嘗出至郊外也。村落閭巷之間，絃管歌聲，合筵社會，晝夜相接。府庫之積，無一絲一粒入于中原，所以財幣充實。城上盡種芙蓉，九月間盛開，望之如錦繡。昶謂左右曰，自古以蜀爲錦城，今日觀之，真錦城也。」

〔4〕參看注〔3〕引《新五代史》六三《前蜀世家》。

二、唐代成都府在全國政治軍事上之地位

漢代西南邊徼內外，民族繁多，但皆弱小，不爲中國患，故蜀郡在全國軍事政治上之地位，尚不甚顯。自蜀漢諸葛亮開發南中，南中經濟人文逐漸發達。東晉南朝與北方政權對峙，蜀居建康上游，而里距遙遠，上游一旦有事，中央無法指揮，故沿江上下擇要地置重鎮，以收分頭負責，隨機應變之效。蜀中北對關、隴，爲東晉、南朝西疆必守之要地，故置益州都督府，治成都，統益、寧兩州及梁州之巴山以南諸郡，〔1〕即今四川、雲、貴地區，皆所統轄。自是蜀郡成都在全國政治軍事上之地位始特顯。南北朝後期，北周先取巴蜀，亦置益州總管府，治成都，管益、潼、巴、瀘等十八州至卅餘州，〔2〕亦盡西南所能控制之疆域，以成滅陳之形勢。隋文統一南北、而以并、益爲兩大重鎮，使兩子分任其事。漢王諒爲并州總管，治晉陽，自河東河北、東盡於海五十二州皆統之；〔3〕蜀王秀爲益州總管，西南道行台尚書令，治成都，統西南二十四州。〔4〕蓋以天下初定，特重益、并，爲京師之兩翼。尤見益州成都在全國政治軍事上之地位。

- [1] 詳拙作《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第三冊《魏晉南朝地方行政制度》第一章第二、三、四節，東晉、宋齊、梁陳都督區。
- [2] 同上第四冊《北朝地方行政制度》第二章第三節北周總管區。
- [3] 《隋書》四五《庶人諒傳》。
- [4] 同上《庶人秀傳》及拙作《隋代總管府考》（《中國學誌第六本》）。

唐代初期，國內承平，吐蕃為患尚不烈，故劍南之軍政地位尚未特顯。稍後外患日亟，至玄宗，於邊防重地置九節度使以鎮之，劍南居其一，領劍南諸州，多至二十餘。^[1]所統之軍，除成都城內之團結營外，統領軍成範圍甚廣。區別言之：西及西北區，有岷江以西弱水（大渡河）以東之西山松（今松潘）、茂（今縣）、維（舊理番西十里）、翼（今茂縣北壘溪營）、當（松州西南，翼州西北二百餘里）、悉（茂州西北三百餘里黑水河谷中）、柘（悉州西北約百里）、雅（今雅安）、黎（今漢源南北）九州軍及平戎（悉州西百六十里約東經103°北緯32°）、天寶（平戎東八十里或維州西約二百里）兩城軍，西南區有越嶲（今西昌）以南瀘水（今金沙江）南北之雲南（今姚安西南約二百五十里雲南驛）、昆明（今鹽源）、寧遠（今鹽源南）三軍及澄川守捉（雲南軍東蓋六十里）東南區有戎（今宜賓）、瀘（今縣）兩州軍。^[2]為當時西南之唯一之大軍政重鎮。

[1] 劍南節度使統州，詳《新唐書》六七《方鎮表》四劍南格。

[2] 劍南節度使統軍，詳《通典》一七二《州郡典》序目下（有脫文），《舊唐書》三八《地理志》、《通鑑》二一五，天寶元年紀及《元和志》三一。今地詳拙作《唐代茂州西通吐蕃兩道考》（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一卷）及《漢唐時代川滇東道考》（總統蔣公逝世周年紀念論文集，中央研究院）、《成都西南岷江瀘水以西交通網》（未刊稿）。

安史之亂，玄宗幸蜀，至德二年，升益州為成都府，置南都，後三年罷京，仍為府，^[1]為天下七府之一。^[2]官名縣等皆突出於諸州之上。且安史亂後，西北之隴右、河西、安西、北庭四節度區皆已失陷，東北之范陽、平盧兩節度區亦失控馭；為國家邊防屏障者，惟朔方（靈武）、河東（太原）與劍南（成都）三節度耳。劍南節度自韋臯極力經營西南諸蠻，又加統押近界諸蠻及西山八國兼雲南安撫使。^[3]其在政治軍事上之作用，不僅限於西南邊防，且於中央政府之拱衛亦有積極之作用。蓋唐代前期，最接近首都長安之唐蕃疆界在青海河曲，去長安二千二百餘里，^[4]安史亂後，隴山以西盡為蕃有，兩軍拒守之邊界去長安不過五百里，蕃軍常入郊甸，而唐都長安仍能屹立百數十年不動搖者，固賴西北朔方軍及其所分滋蕩軍之堅強拱衛，^[5]亦恃劍南節度在西南之犄角也。^[6]吐蕃一旦來逼，則劍南、朔方南北呼應，故蕃軍雖強亦殊難得志。不特此也，萬一長安不守，君主且常賴劍南為內室閩奧，行幸暫避，如玄宗、僖宗先後避地成都，德宗之幸漢中（南鄭），亦作入蜀之計。蓋蜀中富庶，而四面守險，中國歷史上，據有巴蜀以為基地者，雖不能得志於天下，然盛國形勢，天下尚未失御，君主一時暫避，固為不二之閩奧也。^[7]由此言之，唐都長安，外禦強敵，恃劍南成都為支援；

內有急難，又恃劍南成都為退避之內室；其在唐代政治軍事上之地位，於此可見，實非任何其他外府州縣所能比肩。盧求《成都記序》云，劍南之任，非上將賢相文武幹才不能居其位者，檢之吳《表》所列，〔8〕要不盡虛也。

- [1] 《新唐書》四二《地理志》六成都府目及盧求《成都記序》（全唐文七四四）。
- [2] 七府者，除京師京兆府（長安）、東都河南府（洛陽）、北都太原府（太原，今晉源縣）外，為河中府（蒲州）、鳳翔府、江陵府及成都府，具詳《兩唐書·地理志》。
- [3] 《新唐書》六七《方鎮表》四，貞元十一年，「西川節度增領統押近界諸蠻及西山八國、雲南安撫使。」按《舊唐書》一四〇《韋臯傳》，貞元九年命將「出西山及南道，破峨和城、通鶴軍，……焚定康城。」敗吐蕃南道元帥論莽熱。「又招撫西山羌：女（國）、訶陵、白狗、道租、弱水、南水等八國酋長，入貢闕庭。十一年九月，加統押近界諸蠻、西山八國、兼雲南安撫等使。」檢吳廷燮《唐方鎮年表》六《劍南西川節度使表》，元和元年高崇文（引舊記）、大中十一年白敏中（舊紀）、咸通二年夏侯孜（唐大詔今集），皆有此銜；又昭宗復陳敬瑄官爵詔（全唐文九一）亦有此銜。蓋韋臯以後任劍南節度者，皆帶此銜也。所謂西山八國，《韋臯傳》已列其六。按東女國，東接茂州，東南接雅州，見《舊唐書》一九七《西南蠻傳》。道租在維州（今理縣境）西南，雅州靈關之北，詳《唐代雅州西通徼外三道考》（董作賓先生逝世十四周年紀念刊，藝文印書館）。白狗見《冊府元龜》一七〇《帝王部來遠目》，云「天寶元年，益州長史章仇兼瓊奏，吐蕃白狗國及索磨等諸州籠官三百餘人出奉州。望準女國等例，簡擇許令入奏。餘並就奉州宴賞。」奉州雲山郡，在維州西一百六十里，詳《唐代茂州西通吐蕃兩道考》（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一卷），則白狗國亦在維州以西甚明。復考顏真卿《鮮于仲通碑》（全唐文三四三）云：「公誅羌豪董哥羅等數十人，以靖八州之地。郭公（虛己）將圖弱水西之八國，奏公入覲，……既畧三河，收其八國，長驅至故洪州，與哥舒翰隴右官軍相遇於橫嶺。」洪州即保甯都護府，在索磨川（今梭磨河，即大渡河之東源），約東經102°30'，北緯32°以北地區，（詳拙作《唐代茂州西通吐蕃兩道考》）皆足證所謂西山八國者大抵在雅州以北，松、茂以西之邛崃山脈中，實在弱水（大渡河）之東，顏《碑》「西之」似當作「西山」，若「之」不誤，則此弱水僅指索磨川而言。
- [4] 唐、蕃最明白之疆界在赤嶺，嶺東至鄯州三百餘里，鄯州至長安一千九百里，詳《唐代河湟地區交通軍鎮圖考》（新亞學報第十一卷上冊）。
- [5] 唐中葉，京師附近拱衛諸軍之經常建置者有鳳翔、涇原、邠甯、鄜坊四節度使，多由舊朔方軍所分滋；而朔方軍舊基地之靈武，雖在吐蕃軍力極度困擾之下，時或與中央交通阻絕，而仍艱苦據守者，即在欲發揮西北犄角之作用也。參看拙作《唐代河套地區軍事防禦系統》（新亞生活雙周刊1972年12月15日）。
- [6] 劍南與吐蕃雖隔崇山峻嶺，然通道甚多，而劍南之西山，西北接近黃河上源，可威脅吐蕃大軍東北經青海至隴山之大道，故對於吐蕃行軍有牽制作用。《舊唐書》一四〇《韋臯傳》，貞元九年，朝廷築鹽州城，慮為吐蕃掩襲，詔臯出兵牽維之。臯乃出軍破峨和城、通鶴軍，敗吐蕃南道元帥論莽熱。鹽州在長安北千里以上，尚且恃劍南之牽維，則長安之拱衛能藉劍南之犄角，自不待言。
- [7] 《通鑑》二一八至德元年紀，《考異》引《幸蜀記》：「力士曰：太原雖固，地與賊隣，本屬祿山，人心難測。朔方近塞，半是蕃戎，不遵朝章，卒難教馭。西涼懸遠，沙漠蕭條，大駕順動，人馬非少，先無備擬，必有闕供。……劍南雖窄，士富人繁，表裏江山，內外險固。以臣所料，蜀道可行。上然之。」
- [8] 吳廷燮《唐方鎮年表》六劍南節度使卷。

三、城郭與公署

胡三省曰：「凡大城謂之羅城，小城謂之子城，又有第三重城以衛節度使居宅，謂之牙城。」〔1〕疑此為唐末以下之制，前期未必有三重也。〔2〕

〔1〕《通鑑》二四一唐憲宗元和十四年紀胡《注》。

〔2〕胡氏所注之《通鑑》原文云：平盧節度使李師道使劉悟出屯陽穀。悟聞悉被譖將受誅，乃回軍夜襲郾，「距城數里，……使十人前行，宜官劉郾頭奉帖追入城。門者請俟寫簡白使，十人拔刃擬之，皆竄匿；悟引大軍繼至，城中譟動地。比至，子城已洞開，惟牙城拒守。尋縱火斧其門而入。」按此雖不言羅城，但曰子城，牙城，是子城外必有大城。然檢《舊唐書》一五一《劉悟傳》僅云：「以兵取郾，圍其內城，兼以火攻其門，……擒師道。」此內城即《通鑑》之牙城，則《通鑑》之子城，亦可能即外城。疑《通鑑》以唐末宋制說之，殊難定也。惟《元和志》一六魏州朝城縣有羅城，又卷八滑州，「州城即古滑台城。城有三重。又有郾城，周二十里，相傳云衛靈公所築。」則唐中葉已有三重之城。事制究竟如何，當俟詳考。

如成都者，即無外郭之羅城。按成都大築城垣，蓋始於周赧王五年（B.C. 310）。秦惠王使張儀、張若築成都城，周迴十二里，高七丈，「修整里闔，市張列肆，與咸陽同制。」〔1〕漢代蓋續有修葺，〔2〕其後蓋因循未大增修而日漸頹壞。至唐代成都城既卑且隘，又無隍壑；惟或云周僅八里，疑亦未確。蓋此即高駢大築羅城後所謂子城。城內有摩訶池，甚大，其城周圍斷不只數里，殆方廣八里耳。〔3〕僖宗乾符中，高駢為劍南節度使，乃於故城外大築羅城，或云東西南北凡二十五里，城門之外築壅門城八里；或云築城四十三里。疑「二十」為「三十」之譌，羅城與門外壅城共四十三里耳。皆砌之以長磚，使就完整。城高二丈六尺，基廣如之，上廣一丈；城上建女牆，高四尺，開孔以瞭敵陣。「其上樓櫓廊廡凡五千六百八間」，蓋女牆之內也。「城外則繚以長堤，凡二十六里，或引江以為塹，或鑿地以成濠。」蓋江流臨近處不假堤濠之工歟？〔4〕世傳太玄城之名，〔5〕不知是否為當時之名也。

〔1〕《華陽國志》三《蜀志》。

〔2〕看馬先醒《漢代成都之城池與人口》，《史學叢刊》第十期。

〔3〕王徽《創築羅城記》（全唐文七九三）云：「先是蜀城既卑且隘，象龜行之屈縮，據武擔之形勝，里闔錯雜，邑屋闐委，慢藏誨盜，城而弗羅，……舊貫因循，……殆逾千祀。」又云：「其舊城周而復始，蓋八里，高厚之制，大小之規，較其洪纖，可得而辨。」此即記高駢築羅城事，以與舊城相比也。是唐末舊城仍承秦漢之舊，城甚小且低薄。惟八里云云，疑亦未確。何者？張儀所城已有十二里，後又築少城接乎其西，兩城相連共一牆，實為一城。詳見馬先醒《漢代成都之城池與人口》（《史學叢刊》第十期）。則其周圍當近二十里。成都歷兩漢魏晉南北朝，皆為軍政重地，其城垣斷無縮小之理。且《元和志》三一成都府，「摩訶池在州城中。」又《新唐書》二二二中《南蠻傳》中，南詔圍成都，「城中井為竭，則共飲摩訶池。」亦見池在城內。據《蜀橋樑》卷上，王建稱帝，改摩訶池為龍躍池，亦在子城內。復檢《通鑑》二五二咸通十一年紀，述南詔圍成都事，胡《注》：「《成都記》：摩訶池在張儀子城內。隋蜀王秀取土築廣子城，因為池。有胡僧見之曰，摩訶宮毗羅。蓋胡僧謂摩訶為大，宮毗羅為龍，謂此池廣大有龍耳。因名摩訶池。或曰彌摩訶所開，非也。池今在成都縣東南十二里。」是此池甚大，本在子城內，（城外之摩訶池，蓋王蜀改名後，另於城外名之者。而陸游在成都時，亦漸淤廢。）其城必不太小可知。考張詠《益州重修公宇記》（圖書

集成職方典五九四），「按《圖經》……張儀……卜築是城，方廣七里，……分築南北二少城，以處商賈。少城之跡，今并湮沒。……隋文帝封次子秀為蜀王，因附張儀舊城增築南西二隅，通廣十里。今之官署即蜀王秀所築之城中北也。」此即唐代子城也。詠為北宋前期人，據《圖經》言之，亦為早期史料，是唐代舊城方廣十里，儉言之，可能方廣八里也。至於《舊唐書》一八二《高駢傳》云，「成都比無垣墉」，顯非事實，即觀上引《南蠻傳》一條，其事已明，不待詳論。

- [4] 高駢築成都羅城有兩條極重要史料。其一信宗《獎高駢築成都羅城詔》（全唐文八七），其二即注〔3〕所揭之王徽《創築羅城記》。《獎築羅城詔》云：

「省所奏修築羅城畢功并進畫圖事，具悉。卿天平急召，并絡專征，……上言大嶽，空有子城，殊百雉之環迴，是千年之曠闕，便依陳奏……每日一十萬夫，分築四十三里，皆施廣夏，又砌長磚，城角曲收，逸迭攻而勢勝，甕門直截，容拒守之兵多，利及後人，智高前古。……增上頭之睥睨，（女牆開孔外瞭。）架裏面之闌干，橋象七星，不移舊岸，錦逢三月，可濯新濠，役徒九百六十萬工，計錢一百五十萬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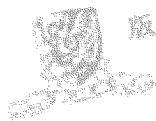
王徽《記》云：

「詔駢復以丞相擁節……趨錦里，……於是擇地置材，拓開新址，……環以大城，用冠諸夏。……十旬之中，屹若山峙。南北東西凡二十五里，擁門卻敵之制復八里。其高下蓋二丈有六尺，其廣又如是。其上袤丈焉，陣四尺。斯所謂大為之防，俾人有泰山之安矣。而甍碧塗墜，既麗且堅，則制破飾頽，又奚以異。其上建樓櫓廊廡，凡五千六百八間。墀榭栴比，闌閣鱗次，綺疏掛斗，簷瓦凌霄，若飛若翔，如偃如仰。」「其外則隄以長堤，凡二十六里，或引江以為塹，或鑿地以為濠。」「中和四年紀。」

按吳氏《方輿表》六，引《通鑑》，高駢以乾符二年正月為西川節度，五年正月遷荆南，築城獎詔皆在其時。王徽《記》則作於中和四年，係駢在淮南日，奏請紀成都築大城事。信宗乃命翰林學士王徽為之。王《記》述羅城規制固甚詳悉，而前此獎詔，亦就高駢築成後所上畫圖，具體言之，並非浮詞。兩相比勘，多相符合。惟《詔》作四十三里，而《記》作南北東西二十五里，外加雍城八里，是不同。若謂《詔》據高駢奏報及圖畫而作，不免誇大，但王《記》亦由駢之奏請乃奉詔而作，對駢恭維備至，不應不從駢旨，而核實為二十五里！且據注〔3〕所考，舊城已方廣十里，至少八里，其周已二十五里，大築羅城必不只此數。意者「二十」為「三十」傳寫之譌，加雍城八里，正得四十三里也。或者，「南北東西凡二十五里」者，非指周圍而言，乃就直徑十二三里言，則周圍亦三十餘里也。《北夢瑣言》七，亦云高駢於成都築羅城四十里，事亦相符。至於王《記》云城外長堤二十六里，或亦字譌，或臨江城段不假堤濠耳！惟考馮時行《羅城記》（宋代蜀文輯存四六）云：紹興二十八年，鄭剛中守蜀，以成都為西南大府，「今城若可踰，墮若可塗」，乃重修羅城，「城比舊，凡周四千六百丈有畸。」不知唐宋里丈應如何折合？若以營造庫平制，1800尺為一里計，則正約二十五里餘，不知前後如何變化也。或者南宋所修仍是舊子城歟？姑記之存證。城「砌長磚」，詔文已言之。《舊》一八二《高駢傳》，「^城之以磚甃，雉堞由是完堅。」甃亦磚也。

- [5] 城名太玄城，見《蜀中廣記》三引宋人《古今集記》。

高駢除築羅城之外，又附做兩項工程。其一，作麩棗堰，引郫江水繞經城北。按古代成都城外有郫、流兩江。郫江一名（成）都江，一名市橋江，一名中江、內江，西北自新繁縣界流來；流江一名汶江，一名管〔笮〕橋水，一名外水江，西南自溫江縣界流來；二江皆流經成都城之西南，磯岸多植紫桐，會於城東南之合江亭。故楊雄《蜀都賦》



云「兩江珥其前」，岑參《張儀樓》詩云「樓南兩江水」也。（按樓在城西門。）而城西有柳池，西北有天井池，城北有龍隄池（隄一作渠）及萬歲池，城東有千秋池，故成都四周實富於水澤。合江亭據丘山，為登臨之勝。城之西南，合江亭之上游兩江上有七橋。直西門郫江上曰沖里〔治？〕橋。城西南石牛門曰市橋，城南曰江橋，皆架郫江上。由江橋又南渡流江曰萬里橋，沿江流西上曰夷里橋，亦曰竿橋。又從沖里橋出折曰長昇橋，郫江上西又有永平橋，此即所謂七星橋也。至於城北十里之昇仙橋，則不在七星之列。高駢築羅城時，乃於城西郫江作糜棗堰，引郫水繞經城北，抱城東而南流，仍會流江於合江亭，蓋溝通諸池而擁帶之，其功不難。至此，成都城四周皆在江流圍繞中，增強城池防禦之形勢。意者今日成都之江流形勢，蓋即肇始於高駢之堰水工程也。〔1〕楊氏《水經注圖》繪兩江分繞城之南北，已如今日之形勢，誤矣。其二，成都地本平野，然負郭尚多邱陵，高駢築城時，頗加鏟削，更就平夷。〔2〕蓋歷代刮夷之功，應復不少，以成今日成都郊野之景觀。

〔1〕楊氏《水經注圖》後附《成都橋圖》，江水在成都西北分為檢、郫二江。檢江在西，東南流經成都城西，繞經城南至東南，謂之南江。郫江流至城西，又向北大曲折，繞經城北城東，謂之北江，亦至城東南與檢江合流。則與今日成都河流之形勢畧相合，然檢《水經注》三三《江水注》云：

「江水又東逕成都縣。……縣有二江，雙流郡下，故楊子雲《蜀都賦》曰，兩江珥其前者也。……初張儀築城取土處，去城十里，因以養魚，今萬頃〔歲〕池是也。城北又有龍隄池，城東有千秋池，西有柳池（按自張儀築城至柳池，皆本之《華陽國志》，惟《志》作萬歲池、龍渠池。檢《寰宇記》及《蜀中廣記》所引舊籍皆作萬歲，《廣記》又引《通志》，萬歲池廣袤十里。）西北有天井池，津流徑通，冬夏不竭。西南兩江有七橋，直西門郫江上曰沖治橋，西南石牛門曰市橋，……大城南門曰江橋，橋南曰萬里橋，西上曰夷里橋，下〔亦〕曰竿橋。……從沖治橋北（華陽志作西）折曰長昇橋，城北十里曰昇仙橋。……李冰沿水造橋，上應七宿，故世祖謂吳漢曰，安軍宜在七星橋連星間。」

按此無郫江流繞城北之文，惟七星橋似包括城北之昇仙橋言之。按七星橋一段乃據《華陽國志》卷三書之。《華陽志》原文云：

「郡治少城，西南兩江有七橋：直西門郫江中沖治橋，（顧曰初學記治作里）西南石牛門曰市橋，下石犀所潛，……城南曰江橋，南流流曰萬里橋（顧據初學記，以為流字衍，非也。）西上曰夷里橋，上〔亦〕曰竿橋（顧引廖云「上」當作「亦」甚是。寰宇記即云竿橋在州西四里，亦名夷里橋，以竹索為之。志作上，郫《注》作下，皆誤，而楊圖從郫《注》之誤文。）橋〔又〕沖治橋西出折曰長昇橋，郫江上西有永平橋。長老傳言，李冰造七橋，上應七星……」（參顧尚之校勘記）。

則有永平橋而無昇仙橋。昇仙橋在城北，《華陽志》前文另述之，不在七星之列甚明。《元和志》亦分作兩條。若數昇仙，何得云「西南兩江有七橋」耶？《江水注》顯誤。蓋昇仙橋因相如故事特出名，故郫《注》偶疏耳。且《蜀中廣記》三昇仙橋條：「李膺《記》云，昇仙水起自始昌堰，有兩叉，中流即昇仙。《成都記》云，城北有昇仙山，昇仙水出焉。」則此昇仙橋固與二江無涉也。

復檢《史記河渠書》，李冰「穿二江成都之中」。《正義》引《括地志》云：

「大江一名茫江，一名管橋水（望按管為竿之形譌），一名清江（賀改清為流），亦名

水江（賀作外水江），西南自溫江縣界流來。（寰宇記七二，「汶江一名笮橋水，一名流江，亦曰外江。」下文同。最正無譌。）**郫江**一名成都江，一名市橋江，亦名中日江（賀云日字衍），亦曰內江，西北自新繁縣界流來。二江並在益州成都縣界。任豫《益州記》云，二江者，**郫江**、流江也。……《華陽國志》云，蜀時濯錦流江中。（參賀次君括地志輯校卷四成都縣條）。

又《元和志》三一成都府目云：

「西南兩江共七橋，李冰所造，上應七星。」

成都縣（在西）：「大江一名汶江，一名流江，經縣南七里」，「萬里橋架大江水，在縣南八里。」

華陽縣（在東）：「**郫江**水在縣南六里。」

據此兩條，唐代成都兩江亦皆在城之西南，汶江又名流江，一名笮橋水，西南自溫江縣流來；**郫江**一名市橋江，西北自新繁縣界流來。合《水經注》觀之，**郫江**之沖治橋固在城西，而**郫江**又名市橋江，市橋亦在城西南，杜翁《西郊》詩云，「市橋官柳細。」（詳注九）《寰宇記》七二，「市橋在州西四里。」是也。則**郫江**自沖治橋仍東南流經城之西南，非折而北繞城之北。故宋呂大防《合江亭記》云：「沱舊循南隄與江並流以東。」（蜀中廣記二引）沱即謂**郫江**，江即謂流江、汶江也。兩江皆在城之西南，故楊雄《賦》云「兩江珥其前」也。又岑參《張儀樓》詩云：「樓南兩江水，千古長不改。」（全唐詩三函八冊岑集一）按此樓為西門之勝，詳《蜀中廣記》二。此則唐代前期兩江仍皆在城南之證。惟《一統志》成都府卷山川目**郫江**、錦江兩條云：

「**郫江**在成都縣北，自灌縣分大江東流，經縣北，又東入成都縣界，繞城北而南，與錦江合，舊統名為二江。」（紀要六七，誤作流江）。

「錦江在華陽縣南，即流江也，自縣西分流至府城東南合**郫江**，折西南入彭山縣界。」（紀要六七，誤作**郫江**）。

則楊《圖》所以致誤者，乃據近代成都兩江分別流經城之南北而繪之耳，不知古代兩江並非如此。

然則今日流江由西南溫江縣境流來，經城之南，**郫江**由西北新繁縣境流來，經城之北，又抱城東至城東南與流江相合之形勢，肇始於何時？按前引王徽《創羅城記》云：「或引江以為壘。」其事不詳。檢《蜀中廣記》二引宋呂大防《合江亭記》云：

「今成都二水，……來自西北而匯于府之東南，乃所謂二江雙流者也。沱舊循南隄與江並流以東。唐高駢即廣其穢，遂塞糜棗故瀆，始鑿新渠，繚出府城北，然猶合於舊渚。舊渚者，合江故亭，唐人宴饌之地，名士題詩，往往在焉。」

按此沱即指**郫江**而言，舊循城之南隄，與汶江（即流江）並流而東，會於合江亭。至高駢始堰塞糜棗故瀆，別開新渠，引**郫江**繞經府城之北，但仍與汶江會於合江亭也。復考宋何涉《糜棗堰劉公祠堂記》（宋代蜀文輯存一一）云：

「故時，汶江跳波，刮午門南，東注；治有子城而無郭郭。唐丞相高駢之作牧也。……謂走集宜險，因度高城其外，周數十里；……築隄**郫江**，號糜棗堰，折湍勢，匯於新城北，以由休養生聚，護此土。」

此與呂大防《記》合，知高駢築羅城，並堰**郫江**故瀆，引其水改道流經城北也。復檢《紀要》六七流江條引《元豐志》云：

「二江舊皆從城西入，唐高駢築羅城，遂從西北作糜棗堰，塞故瀆，更鑿新渠，導外江繞城西而北（當作南），內江繞城西而南（當作北），下流仍合於舊渚，舊渚者合江亭也。」

《一統志》成都府卷山川目引作《九域志》，內容全同。按《元豐九域志》實無此文，其書體例亦不應有此一段，然參之前引宋人呂大防、何涉兩《記》，此事不誤，或許《紀要》、

《統志》所引為別一舊志，而誤標為《元豐九域志》耳，然非無徵之言也。以其敘事最明，故仍取之以資說明。復按前引《江水注》，成都城西本有柳池，西北有天井池，城北有龍隄池、萬頃池，城東有千秋池，高駢於城西堰江，使其繞經城北，復匯於東南固不難，遂成今日兩江圍繞城垣之形勢。

合江亭 前引呂大防《合江亭記》，云為「唐人宴餞之地。」《廣記》二又引唐符載云：「一都之奇勝也。是亭鴻盤如山，橫架赤霄，廣場在下，砥平雲載，而東南西北奠然矣。」是居於丘山高敞地。

江岸植紫桐，見李德裕《畫桐花鳳扇賦序》，（全唐文六九六）。

[2] 《蜀中廣記》三引《古今集記》云：「高駢以成都土惡，城歲壞，易以磚甃，凡負城邱陵悉平之，以便農桑。」按成都近郊實有邱陵，如段文昌《菩提寺置立記》（全唐文六一七）云：「蜀城正南當二江合流之上，萬井聯臺之內，獨有岡阜，迴抱數里，地形含秀而高坦，……」即為一例。高駢蓋有平鋤丘陵之功，然其前其後，當有相類之工程，惟不能詳考耳。

五十年後，至後唐明宗天成二年，孟知祥鎮蜀，又於羅城外增築羊馬城。並就舊羅城加工築之，使更鞏固，其長四十二里，基廣二丈二尺，上濶及高皆一丈七尺，女牆四尺。此蓋大體標準，亦畧承高駢工程之成規耳。^[1]後蜀孟昶於城上植芙蓉花，故世傳為芙蓉城，或云僅指宮城而言。^[2]

[1] 《通鑑》二七六，後唐天成二年，「十二月戊寅朔，孟知祥發民丁二十萬修成都城。」按知祥時為西川節度使，兩年以後即以劍南反，蓋豫為之謀矣。此次築城，有李昊《創築羊馬城記》（全唐文八九一）記之甚詳云：

「公一旦謂將吏曰，夫華陽舊國，宇內奧區……郭郭則樓台疊映，珠碧鮮輝，……闕固基布，墉陌駢羅，不戒嚴陣，是輕武備，……將沮豺狼之意，須營羊馬之城，……封章上奏，揆日量工。……公間日巡撫，役者忘疲，……繞踰三旬而成，……遠而望之，象衆山之連遷，俯而瞰之，若峭壁之斗懸，擱大塚以連延，增長堤而固護，……摩壘者詠之摧心，守陣者由之示暇，舊城崢嶸而後竦，新城筵紫以前騰。勢而言之，若秦嶽之與梁甫；亞而稱矣，若夫子之與顏回！」

此謂於羅城外加築羊馬城也。其功三旬而畢。然下文續云：

「公以羅城雖設，智有所虧，重築大敵(?)鎮於四角，巖岑桂兔，突吼栖鳥，嚴樓櫓於穴寥，懸刀斗於天表。……詔書勅知祥，省所奏，重修葺當府城池，已取十二月一日興功事，具悉。……自天成二年丁亥歲十二月一日起工版築，至三年正月八日畢手，……詔曰敕知祥……修治城壕畢功事具悉。百堵皆興，四旬而畢，互羅城而雲矗，引錦水以環流，……其新城周圍凡四十二里，竦一丈七尺，基濶二丈二尺，其上濶一丈七尺，別築陣四尺，壘壕一重，其深淺濶狹，隨其地勢。自卸版日，構覆城白露舍四千九百五十七間，內門樓九所，計五十四間。至三月二十五日停運斧斤。其版築採造，軍民共役，三百九十八萬工。其執事滋糴，及役罷賞資斗支秤給綉貫裝，其數凡費一百二十萬。」

此謂又就羅城加功使更鞏固，四旬畢工。此文寫得甚為囁嚅，文理不清，然接連兩度築城，先於舊羅城外築羊馬城，又嫌羅城不固，再加工築之，則甚明，惟後段「其新城周圍凡四十二」云云，不知指羊馬城言，抑指羅城言耳！按《通典》一五二《兵典》五守拒法條：「城外四面壕內去城十步更立小隔城，厚六尺，高五尺，仍立女牆，謂之羊馬城。」則羊馬城只在大城外十步或極近處，甚低薄，則此周圍高厚之制，恐仍當指羅城而言耳，云四十二里，亦正高駢羅城之長度也。

[2] 《紀要》六七成都華陽縣：「芙蓉城，或曰孟蜀宮院城，後主預盡種芙蓉於城上，謂左右

曰，此誠錦城矣。」按張立有《詠蜀都城上芙蓉花詩》云：「四十里城花發時，錦巒高下照坤維。」又《詠》云：「去年今日到成都，城上芙蓉錦繡舒，今日重來舊遊處，此花顛顛不如初。」（全唐詩十一函六冊）似指全城而言。

成都本城之外，其南十里別有錦城，在大江（即流江）南岸，即古錦官城也，自古為織錦名地。蓋成都西南，此段江流因某種物質溶液而特利於濯錦，故有錦江之名，特築城於江水之濱，作為製錦工業中心，置官經營，故有錦官城之名。〔1〕至宋代以後，成都城東江流亦有錦江之名者，蓋推衍美名及於城東耳。〔2〕

〔1〕《元和志》三一成都，「錦城在縣南十里，故錦官城也。」（杜詩「錦官城外柏森森」之錦官城，亦可能泛指成都城而言。）檢《華陽國志》三，始文翁立郡文學，在所南，後州徙為州文學，「郡更於夷里橋南岸道東邊起文學，有女牆。其道西城，故錦官也。錦江織錦，濯其中則鮮明，……故命曰錦里。」又云：「城南曰江橋，南渡流曰萬里橋，西上曰夷里橋。」按《元和志》云：「萬里橋架大江水，在縣南八里。」是此城在大江之南，萬里橋之西，竿橋南道之西。

〔2〕費著《成都遊宴記》（學海類編集餘八）：「七月七日晚宴大慈寺設廳，暮登寺門樓望錦江夜市，乞巧之物皆備焉。」按大慈寺在城東，不在城南。是宋代城東已有錦江之名也。

至於城門，成都早期諸城門未能詳考，〔1〕而《蜀檣杙》卷上云：朱全忠篡位，王建亦在蜀稱帝，「改堂宇廳館為宮殿」，亦改諸城門名稱云：

「大衙門為宣德門，獅子門為神獸門，……球場門為神武門，……西亭門為東上閣門，亭子西門為西上閣門，節堂門為日華門，行庫角門為月華門。萬里橋門為光夏門，竿橋門為坤德門，大東門為萬春門，小東門為瑞鼎門，大西門為乾正門，小西門為延秋門，北門依舊太玄門。子城南門為崇禮門，中隔為神雀門，東門為神政門，西門為興義門，……北門為大安門，中隔為玄武門。」〔2〕

按大衙門至行庫角門即節度使牙城諸門，萬里橋門至太玄門即高駢所築羅城諸門，子城則舊城也。是子城南北各有隔牆，其四門及南北隔牆共六門；而高駢羅城則有七門也。〔3〕羅城除北面僅有一門曰太玄門外，南面有二門，萬里橋門在東，正對萬里橋；〔4〕竿橋門在西，當正對竿橋；〔5〕東西各二門，大東、大西皆在北；小東、小西皆在南。〔6〕

〔1〕參看馬先醒「漢代成都之城池與人口」，《史學集刊》第十期。

〔2〕《茅亭客話》三張道者條，「僞蜀大東門外，有妙圓塔院。」則王建雖改名，但民間仍稱舊名，或後蜀又改復唐名也。

〔3〕《蜀檣杙》歷述諸門改名，而曰「北門依舊太玄門。」足見改與不改皆已列入，故知本僅七門。

〔4〕《元和志》三一成都府，「萬里橋架大江水，在縣南八里。」

〔5〕《寰宇記》七二益州，「竿橋在州西四里，亦名夷里橋，又名竿橋，以竹索為之，因名。」按《元和志》三一，「大江……一名流江。……蜀中又謂流江為懸竿橋水。」是竿橋亦架大江水。檢《華陽志》三「城南曰江橋，南渡流（江）曰萬里橋，西上曰夷里橋，上曰竿橋。」《水經》《江水注》作「下曰竿橋」。「上」「下」不同，實皆「亦」之形譌。是此橋在城

西南，竿橋門必在南城之西段無疑。

〔6〕范成大《吳船錄》上，發成都曰，「泊舟小東郭合江亭下。」按合江亭在城東南，則小東郭指東城之南段而言，此即小東門所在。以此例言，小西門蓋與小東爲對。且《蜀檣杙》卷下，後蜀廣政十五年六月，「岷江大漲，……大水漲城，壞延秋門，深丈餘，溺數千家。」延秋門即唐之小西門，岷江即大江，經城西南，不經城西北；尤爲此門在西城南段之證。

城內政府機關之可知者：節度使府在牙城內，有大廳、毬場廳、蜀王殿、九頂堂、清風樓、會仙樓、節堂、行庫等；又有衙庫、衙內勳佑庫、衙內雜庫等，蓋亦在牙城內。成都府司在子城內。又有設廳、軍資庫、賞設庫、賞設行庫、南倉、北倉、贍軍東庫、甲仗庫、府城司、防城司、馬步司、虞候司、後槽、客司、樂營、神策營等，蓋分佈子城、羅城內者。〔1〕當有驛，但名稱無考；可考者惟臨途館。〔3〕

〔1〕諸廳、堂、庫、司名稱皆見《蜀檣杙》卷上，王建稱帝，改諸堂宇廳館爲宮殿條。各機構之作用或顧名而知義，或觀其改立新名而可知者，不詳引錄。

〔2〕《寶刻類編》六有虛正《臨途館記》，會昌中立，在成都。此當爲成都之一驛館。

四、坊市與四季市集

成都都市區域，古有一百二十坊。〔1〕唐代坊數當不少，其可考者有金馬、〔2〕碧雞、花林、〔3〕錦浦、〔4〕龍池〔5〕等坊。又或有金容坊。〔6〕

〔1〕《杜詩詳注》九《西郊詩》注引《梁益記》。

〔2〕見《蜀檣杙》上。

〔3〕兩坊見《錦里耆舊傳》五大順二年條。又《茅亭客話》三勾居士條，瓦屋和尚，日本人，嗣洞山悟本，天復初入蜀，住碧雞坊禪院。按杜翁《西郊》，「時出碧雞坊，西郊向草堂。」（詳注九）是此坊在西城。

〔4〕此坊名見《太平廣記》一三三李貞條引《徽戒錄》。蓋臨錦江歟？然錦江在城南外。

〔5〕秀川《中國印刷術史話》頁一六，唐成都龍池坊卡家印佛經。

〔6〕《蜀中廣記》二引老杜《石筍行注》：「成都子城西金容坊有石二株，挺然聳峭，高丈餘。」余孤陋，不見杜詩有此注，姑存之。

左思《蜀都賦》先述成都城內之宮殿里閭；然後云，「亞以少城，接乎其西。市廛所會，萬商之淵；列隧百重，羅肆巨千，賄貨山積，織麗星繁。」劉《注》：「少城，小城也，在大城西，市在其中。」則南北朝以前，市在少城；而大城無市。唐代成都有三市，始見於《通鑑》乾符六年紀。三市者，東市、西市、南市，且或加大爲稱。〔1〕然未必皆在城內，〔2〕城南又有米市者，蓋南市之一區歟？又有馬市、炭市等，可能亦在三市，分別各爲一區耳。〔3〕至於韋莊所謂酒市，或僅指酒肆而言，未必爲劃定之一區也。〔4〕三市中除經營各種行業外，大東市且有養病院，此猶如長安、洛陽市中之有病坊；〔5〕又有佛寺，亦如長安東市之有寺也。〔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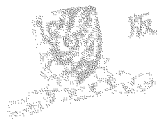
〔1〕《通鑑》二五三乾符六年條，四月庚申朔，甲子，西川節度使崔安潛「出庫錢千五百緡，分置三市，置榜其上曰，有能告捕一盜，賞錢五百緡。」胡《注》：「成都城中，鬻花果、蠶

器於一所，號蠶市；鬻香藥於一所，號藥市；鬻器用者，號七寶市。」按蠶市、藥市、七寶市為季節性之市集，不在同時，詳下文。此處三市當如長安兩市洛陽三市之比，為三處恆置之市場。《錦里耆舊傳》六，後唐滅蜀，「魏王遣李嚴於三市慰諭軍人百姓。」亦此三市也。胡《注》殊誤。

至於三市之名稱，考杜翁《春水生》云：「南市津頭有船賣，無錢即買繫離旁。」（詳注一〇）是成都有南市。據《金石萃編》八八《章仇元素碑跋》引《四川通志》，大南市為章仇兼瓊節度時所興。復考《茅亭客話》七盲女條，「庚子歲，天兵討益部，……南市渠中有一盲女，……」此已真宗世。又《續通鑑長編》一二二寶元二年，益州南市火。此已仁宗世。蓋承唐五代有南市也。又《北夢瑣言》七：「綿竹縣民王氏……家在成都西市，曾負人錢三萬。」《茅亭客話》四陳損之條，「僞蜀王氏時有郎官陳損之，……太平興國中……遠孫息輩住西市，造花為業。」是成都有西市。又《廣記》八五擊竹子條引《野人閒話》：「擊竹子……在成都酒肆中，以手持二竹節相擊，鏗然鳴響……以唱歌應和……如此則十餘年。一旦自詣東市賣生藥黃氏子家……」《茅亭客話》四史見魂條：「蜀人也……居數間屋於東市，……行至市南勾氏家酒肆前。」同書三淘沙子條：「僞蜀大東市有養病院，凡乞丐貧病者皆得居之。」同條又云：「時東市國清寺街」云云。是成都又有東市。綜上所考，唐及五代，成都有東、西、南三市或加大為稱，前引《通鑑》二五二與《錦里耆舊傳》之三市必此三市無疑。至於加藤繁《唐宋時代之市》（支那經濟史考證卷上）引《續通鑑長編》咸平三年十月甲辰條，成都有北市。此已入宋四十餘年，可能為宋代新建之市，非必唐五代之舊，今姑不列。

- [2] 《寰宇記》七二成都目，「市橋在州西四里。」引李膺《益州記》，「漢舊州市在橋南，因以名。」是漢市在城外。則唐市亦未必盡在城內。
- [3] 《茅亭客話》四王太廟條，「僞蜀成都南米市橋，有柳條家酒肆。其時皆以當爐者名其酒肆。柳條明悟，人多狎之。」按杜翁《西郊》詩云：「市橋官柳細」（詳注九）《詳注》：「《華陽國志》，成都西南石牛門外曰市橋下，石犀所潛淵也。李膺《益州記》，冲星橋，市橋也。在今成都縣西南四里，漢舊州市在橋南，因以為名。（寰宇記七二成都目亦云「市橋在州西四里」引李膺益州記相同，惟不言即冲星橋。）未知即此米市橋歟？又《通鑑》二五五中和二年，阡能叛敗，其孔目官「釘於馬市」。同書二七〇梁貞明三年，蜀誣大將劉知俊，收「斬於炭市」。此殆如米市之比。
- [4] 韋莊有《傷灼灼》詩，本注云：「灼灼蜀之麗人也，近聞貧且老，殞落于成都酒市中。」（全唐詩十函九冊韋集六）此酒市當如[1]條引《廣記》擊竹子條及[3]條引《茅亭客話》王太廟條之酒肆。又如《北夢瑣言》二〇，「王蜀時有鬻銀之肆」。此等不過指店舖而言。
- [5] 《茅亭客話》三淘沙子條：「僞蜀大東市有養病院，凡乞丐貧病者皆得居之。」按《通鑑》二五四僖宗廣明元年，「神策軍士……多以金帛雇病坊人代行。」胡《注》：「《會要》，開元五年，宗環等奏，悲田病坊，從長安以來置使專知，乞罷之。至二十二年，京城乞兒有疾病，分置諸寺病坊。至德二年，兩京市各置普救病坊。」蓋大都市皆置之歟？
- [6] 《茅亭客話》三淘沙子條又云：「時東市國清寺街有民宇文氏宅」云云。是市中有佛寺。按《唐兩京城坊考》三，長安東市有資聖寺，在市西坡。

宋代成都春夏秋冬各有季節性之會市，春曰蠶市，夏曰扇市，秋曰藥市，冬曰七寶市。蓋春日蠶事方起，夏日雷扇最殷，秋日宜將進補，冬日收穫已盡，準備什物度歲，故各因時會市，而以最暢銷之貨品命名也。每屆會市，除所以命名之器物商品外，他如珍玩、花果及其他一切貨品莫不畢陳。其集市場所，據《方輿勝覽》，除扇市在街中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嚴耕望

外，其餘三季市皆在東門大慈寺前。^{〔1〕}

〔1〕前引《通鑑》二五三乾符六年胡《注》，「成都城中鬻花果蠶器於一所，號蠶市；鬻香藥於一所，號藥市；鬻器用者，號七寶市。」檢《蜀中廣記》二《名勝記》引《方輿勝覽》云：

「成都，古蠶叢之國，其民重蠶事，故一歲之中，二月望日鬻花木蠶器，號蠶市；五月鬻香藥，號藥市；冬月，鬻器用者，號七寶市；俱在大慈寺前。宋祁《大慈寺前蠶市詩》，蜀雖云樂土，民勤過四方，……所以農桑具，市易時相望，野氓集廣廡，眾賈趨寶坊，……茲會良足喜，後賢無忽忘。田況《大慈寺前蠶市詩》，高閣長廊門四開，新晴市井絕塵纖，老農肯信憂民意，又見笙歌入寺來。」

是蠶市在二月望日，藥市在五月，七寶市在冬月，不是同時，但皆在大慈寺前。而檢《一統志》成都府卷古蹟目蠶市條引《方輿勝覽》則云：

「蜀民重蠶事，每歲二月望日，於府治東大慈寺前鬻蠶器，謂之蠶市；又五月賣扇於街中，謂之扇市；五月九日於市前鬻香藥，號藥市；冬月於市前鬻器用，號七寶市。」

是兩書所引同一書之同一條，而文字頗有出入，合而觀之，各有脫譌：《廣記》「五月」下實脫扇市事及藥市月份；《統志》藥市、七寶市之「市前」皆為「寺前」之譌，第二個「五月」為「九月」之譌，藥市在九月九日，詳下文。則春夏秋冬各有一種市集，各該會市之主要交易貨品即為當季暢銷者。下文分別討論之。

此諸季節性之會市，大抵唐代已有之，有興於唐代以前者。茲分別論之。

蠶市，蓋因春季蠶事方興，兼以蠶叢氏故事而受名。^{〔1〕}其名稱始見，蓋以韋臯《蠶市記》及眉娘《和卓英英錦城春望詩》為最早。詩云：「蠶市初開處處春，九衢明豔起香塵。」則唐代中葉，成都蠶市已盛。^{〔2〕}據陳谿所記，唐代蜀中州縣皆有蠶市，不限於成都也。^{〔3〕}復考，《續高僧傳》云：「蜀土尤尚二月八日，四月八日」，屆時「四方大集」，此殆即蠶市，則所從來久矣。^{〔4〕}或以為諸葛所創始，殆蜀人尊仰之習性歟？非必始於蜀漢也。^{〔5〕}至唐末五代，下及宋世，此種春季定期市集之風習益盛。《茅亭客話》云：「每年正月至三月，州城及屬縣循環一十五處」舉行。而以二月望日州城之大慈寺會市為最盛。屆時商旅輦百貨而至者萬計，蓋以蠶農之具為主，而士大夫優閒階級亦乘時遊宴尋樂，競奢鬥侈，故闐闐填委，至為熱鬧，是以屢屢見於詩詞筆記文字也。韋莊《怨王孫詞》云：「錦里蠶市，滿街珠翠，千萬紅妝。玉蟬金雀，寶髻花簪，鳴璫繡衣長。」尤足為唐末五代初期文人描寫蠶市遊樂盛況之代表。^{〔6〕}

〔1〕注〔6〕條引《茅亭客話》卷九鬻龍骨條。

〔2〕《輿地碑記目》卷四，成都府有《蠶市記碑》，「韋南康文，在華陽縣寶曆寺。」按此碑當作於貞元中。眉娘《和卓英英詩》，收入《全唐詩》十二函七冊，據《小傳》，順憲時人。又《卓英英小傳》，為成都女郎。

〔3〕陳谿《彭州新置唐昌縣建德草市（畧）等記》（全唐文八〇四）云：

「吳公行會……以唐昌縣中界接導江、郫城，東西綿遠不啻兩舍，……昔置郵亭，廢毀將久，……遂陳於連帥，于其心而置草市，因其鄉名，以建德為號，……則百貨咸集，蠶類莫遺。……昔武侯以蜀腥脆，故令鄰邑蠶日而市，意在習其筋力，而俟之征徭；又每及上春，以蠶為名，因定日而有知（當已）所往。公亦約之以期而候之。其日商旅輦

貨而至者數萬，珍纖之玩悉有，受用之具畢陳。……」

按此文作於咸通十年，云蜀中鄰邑朔日而市，又以上春刻日為蠶市，建德蠶市，商旅數萬，珍纖之玩，受用之具悉陳，是唐代蜀中州縣早有蠶市之俗之明證，不限於成都。陳氏歸之於諸葛。此蜀人尊仰之習性，實際上可能更早，亦可能起於南朝時代，不可確考。

[4] 《續高僧傳》二五（大正藏）《釋德上傳》附《旭上傳》云：

「時益州草堂寺旭上者，……少居草堂。……蜀土尤尚二月八日，四月八日，每至二時，四方大集，馳聘遊遊，諸僧忙遽無閑者。」

此雖不云蠶市，度其時間情形，必即蠶市會集也。時在唐初或稍前，則其俗必始於隋以前。

[5] 見上文[3]條引陳谿《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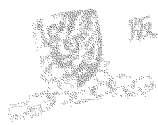
[6] 唐末史料可考者有司空圖一詩，韋莊一詞。司空圖《漫題詩》云：「蝸廬經歲客，蠶市異鄉人。」（全唐詩十函一冊）時圖從僖宗在蜀。韋莊《怨王孫詞》收入《全唐詩》十二函十冊。

五代末世，所見史料尤多。最重要者，如《茅亭客話》卷九鵝龍骨條云：

「蜀有蠶市，每年正月至三月，州城及屬縣循環一十五處。舊相傳，古蠶農氏為蜀主，民無定居，隨蠶所在致市居，此之遺風也。又蠶將興，以為名也。因是貨蠶農之具及花木果草藥什物。」

此條言簡而內容豐富，涉及名稱由來與時間、地點，及商集諸貨。其他分別涉及此等各方面及市容熱鬧之情況者彙列如次：

1. 《五國故事》卷上：「（王）建在偽位十有二年，……蜀中每春三月為蠶市。至時貨易畢集，闕闕填委，蜀人稱其繁盛。而建嘗登樓望之，見其貨桑栽者不一，乃顧左右曰，桑栽甚多，儻稅之必獲厚利。」
2. 花蕊夫人《宮詞》：「春早尋花入內園，競傳宣旨欲黃昏，明朝駕幸遊蠶市，暗使氈車就苑門。」（全唐詩十一函十冊）
3. 《茅亭客話》卷五白蝦蟇條：「偽蜀將季，延秋門內嚴真觀前蠶市，有村夫鬻一白蝦蟇，其質甚大，兩目如丹。」（觀下文，此為蝦蟇化石。）據《蜀檣帆》卷上，王蜀改小西門為延秋門，是在西城，蓋蠶市之一。
4. 同上鮮于春宿條：學射山昔有張百子以三月三日昇仙。今山上至真觀「每歲是日傾城士庶，四邑居民咸詣仙觀，祈乞田蠶，當時春煦，花木甚盛，州主與郡寮將奴樂出城至其地，車馬人物闐噎……。」又《雲笈七籤》卷一二《神仙感遇傳》于滿川條：「于滿川者，成都樂官也……忽三月三日，滿川於學射山通真觀看蠶市。」觀名有一字之異，實即一地。（參一統志成都府卷寺觀目）是亦成都蠶市之一也。按《通鑑》二五七光啓元年，王建進軍學射山，敗西川將於蠶此。胡《注》：「《九域志》，成都縣有蠶此鎮。」殆與學射山之蠶市有關。
5. 宋陳元靚《歲時廣記》（《學海類編集餘八》）卷一遊蜀江條引杜氏《壺中贊錄》云：「蜀中風俗，舊以二月二日為踏青節，都人士女絡繹遊賞，綦幕歌酒，散在四郊。歷政郡守，慮有強暴之虞，乃分遣戍兵於岡阜塚塚之上立馬張旗望之。乖崖公帥蜀，酒曰，慮有他虞，不若聚之為樂。乃於是日，自萬里橋，以錦繡器皿結綵舫十數（費著成都遊宴記，作「數十」，學海類編集餘八）隻，與郡僚屬官分乘之，妓樂數船，歌吹前導，命曰遊江。於是郡人士女駢於八九里間，縱觀如堵。抵寶歷寺橋，出譙於寺內。寺前創一蠶市，縱民交易，嬉遊歡樂，倍於往歲，薄暮方回。」
6. 同上同卷鬻蠶器條云：「樂城公《蠶市詩序》云：眉人以二月望日鬻蠶器，謂之蠶市焉。東坡先生詩云：蜀人衣食常艱苦，蜀人行樂不知還……閒時尚以蠶為市，共牽辛苦逐欣歡。又張仲舒詞云：成都好，蠶市趁遨遊，夜放笙歌喧紫陌，春邀燈火上紅樓，車



馬溢瀛洲。人散後，滿館喜綢繆，柳葉已饒煙黛細，柔條何似至纖柔，立馬看風流。」
7.《成都遊宴記》：「正月……五日，五門蠶市，……太守即門外張宴。……二十三日，
聖壽寺前蠶市，張公詠始即寺爲會，使民鬻農器。太守先詣寺之都安王祠奠獻，然後
就宴。」「三月三日，出北門宴學射山。既罷後，射弓。蓋張伯子以是日即此地上升。
巫覡賣符于道，遊者佩之，以宜蠶辟災。」（按此只云宜蠶辟災，不云蠶市。據上引茅
亭客話等書，實爲蠶市。）……二十七日，大西門睿聖夫人廟前蠶市。初在小市橋，田
公以禱雨而應，移于廟前。太守先詣諸廟奠拜，宴于淨衆寺，晚宴大智院。」（學海類
編集餘八）

據此諸條，及前引《方輿勝覽》，有足證補唐代史料及《茅亭客話》鬻龍骨條者。其一，時
間每年正月至三月，循環開市之可考者：正月五日在五門，正月二十三日在聖壽寺，二月二
日在寶歷寺，二月十五日在大慈寺，三月三日在學射山通真觀，三月二十七日在大西門睿聖
夫人廟，又某日在小西門內嚴真觀，有爲宋人所始興者，時間地點蓋時有改易，而以大慈寺
爲盛；至於《續僧傳》之二月八日，四月八日，蓋又早期之時日矣。其二，士大夫優閒男女
因春季會市，而馳騁遊宴，競奢鬥麗，成爲集市一大特色，亦爲早期史料得以傳存之原
因，如眉娘詩、韋莊詞是也。即如《續僧傳》一條，亦以「馳騁遊遊」而入錄耳。其三，商
品雖以蠶農之具爲主，但四方商旅所湊，實不以此爲限，諸凡珍玩、花草、藥物、什貨莫不
畢備，陳谿記唐昌蠶市云：「珍纈之玩悉有，受用之具畢陳」，料成都商賈之盛必又過之。
又《歲時廣記》（學海類編集餘五）卷一售農用條：

「《四川記》：同州以二月二日與八日爲市，四處村民畢集，應蠶桑所用，以至車楸椽
木果樹器用雜物皆至，其值千緡至萬緡者。郡守就子城之東北隅龍興寺立山棚，設輦幕
樂，以宴勞將吏，累日而罷。」

此引《四川記》，而云同州。按此條前「遊蜀江」，後「鬻蠶器」皆記四川事。前條記張詠
在成都創寶歷寺蠶市事，後條記眉州蠶市事。三條連貫，此條居中，又引《四川記》，必非
陝西之同州無疑。是必當爲川中之一州名，譌爲「同州」耳。此亦可爲成都蠶市商品無所不
有之旁證。抗日期間，我在成都，猶及見蠶市之盛，殆仍與唐宋時代無大異也。

藥市之名蓋起於晚唐，殆以蜀中多藥材、多貨藥者爲背景。^[1]惟至宋世，藥市之
名始多見於載記，然亦不一地一時，成都以外亦有之，商品貨易亦不限於藥物，士女亦
乘興遊宴，一切都如蠶市。成都藥市以九月九日爲盛，市集之地或云城東大慈寺，或云
在玉局觀，蓋時代先後有異歟？此殆亦唐末舊俗之衍續也。^[2]

[1] 起於晚唐，詳[2]條引《歲時廣記》。按自唐以前，蜀中所產藥物品類爲最多，此觀孫星
衍等所輯《神農本草經》可知；又觀《太平廣記》所記故事，亦見成都賣藥者爲最多，蜀地
有藥市之形成，事非偶然。

[2] 據宋人記事，藥市起於唐大中時代之梓州，惟迄宋世，其名始多見於史籍筆記。宋代成都
藥市之史料，加藤繁所輯已甚豐富，見其所著《唐宋時代の市》；惟失《方輿勝覽》一條
耳。茲本其所錄，綜合述之。

《歲時廣記》卷三六置藥市條引《四川記》云：

「唐王昌遇梓州人，得道號元子。大中十三年九月九日土昇，自是以來，天下貨藥輩皆
於九月初集梓州城。八日夜於州院街易元龍池中，貨其所賣之藥，川俗因謂之藥市，遞
明而散。遼國朝天聖中，燕龍圖肅知郡事，又限爲三日，至十一日而罷。藥市之起，自
唐王昌遇始也。」

是藥市最遲當始於唐代後期，但先在梓州。《續通鑑長編》六乾德三年二月癸卯條「呂餘慶知

成都府。……時盜四起，將士猶恃功驕恣，王全斌等不能禁。一日藥市始集，……有軍校被酒持杖，奪賈人物，餘慶立命擒捕，斬之以徇。」按此年宋始滅蜀，疑成都之有藥市當不遲於唐末也。同書七三大中祥符三年三月辛巳條，「蔡汝使四川還，言川峽每春，州縣聚遊人貨藥，謂之藥市。」是成都、梓州外，諸州縣皆有之，而云在春月。復考《鐵圍山叢談》六，「成都故事，歲以天中重陽時開大慈寺，多衆人物出百貨其間，號名藥市。」又《龍川別志》下，「張安道知成都日，……重九請出觀藥市，五更市方合而雨作，入五〔玉〕局觀避之。」《歲時廣記》三六吸藥氣條引《四川記》：「成都九月九日爲藥市。詰旦盡一川所出藥草異物與道人畢集，帥守置酒行市以樂之，別設酒以饗道人。是日早，士人盡入市中，相傳以爲吸藥氣愈疾。《老學庵筆記》六，「成都藥市以玉局化爲最盛，用九月九日；《楊文公談苑》云七月七日，誤也。」是成都實在九月九日無疑。《楊文公談苑》叙月日雖誤，但云「凡三日而罷」（《歲時廣記二八市藥物條引），可補諸家所未備。又費著《成都遊宴記》（《學海類編集餘八）：

「二月八日，觀街藥市，早宴大慈寺之設廳，晚宴金繩院。」「三月九日，觀街藥市，早晚宴如二月八日。」「九月九日，玉局觀藥市，宴監司賓僚于舊宣詔堂，晚飲於五門凡二日，官爲幕帶棚屋，以事遊觀。」

是成都藥市除秋九月九日外，又有二月三月各一次；而要以重陽玉局觀一次爲盛。然《鐵圍山叢談》云重陽大慈寺藥市，及加藤失引之《方輿勝覽》亦云九月九日大慈寺藥市，當亦指最盛者而言。且成都寺觀，規模之大，以大慈寺爲首，宜其藥市爲盛。檢《叢談》此條所書爲政和以前事，蓋北宋以大慈寺爲盛歟？至於蔡汝云川峽「每春」云云，疑誤指蠶市爲藥市歟？據上文所引，藥市會集，除藥物外，亦百貨畢陳，官吏士女亦乘興遊觀，一如蠶市也。

至於扇市、七寶市，唐世無考，宋世史料亦不多見。然唐以前成都已有「七寶」故事，如七寶樓；五代成都鑄七寶鐘，花蕊夫人有「七寶蘭干」之語，疑宋代成都冬季百貨會集之市稱爲七寶市者，當亦上溯宋以前也。^[1] 五月扇市則僅見於宋人一兩處記載，五代以前更無踪跡可尋；惟觀李德裕《桐花鳳扇賦》，成都扇市亦有始於唐代之可能。^[2]

[1] 七寶市僅見於前引《通鑑》胡《注》及《方輿勝覽》。考「七寶」之名亦早見於成都故事。吳會《能改齋漫錄》七杜石筍行條引《華陽記》，「開明氏造七寶樓，以真珠結成簾。」又引趙清獻《蜀郡故事》，「石筍在衙西門外，二株雙蹲，云真珠樓基也。昔有胡人於此立寺爲大秦寺，其門樓十間，皆以真珠翠碧貫之爲簾。」《蜀中廣記》二，所引相同，惟《華陽記》作李膺《記》。是成都早有七寶樓之名。又《輿地紀勝》六九景物目下七寶鐘條：「君山鐘，七寶所鑄，高六尺，廣二尺五寸。蜀孟利以此鐘爲馬希範壽，希範以賜君山。」是北宋以前，成都以七寶爲事物名稱之一例。復檢花蕊夫人《宮詞》云：「七寶蘭干白玉除」，（全唐詩十一函十冊）故疑七寶市之名殆亦唐末五代已有之。（《歷代名畫記》三，「〔西京〕大雲寺東浮圖北有塔，俗呼爲七寶塔，隋文帝造。」此亦較早期史料，但不在蜀，姑附記之。）

[2] 成都扇市，惟見前引《一統志》所引《方輿勝覽》一條。又加藤繁引陳元觀《歲時廣記》二一送鼓扇條云：

「《歲時雜記》：鼓扇百索市，在潘樓下，麗景門外，闕闔門外，朱雀門內外，相國寺東廊外，陸親廣宅前，皆賣此物。自五月初一日，富貴之家多乘車卒買以相饋遺。鼓皆小鼓，或懸於架，或置於座，或設鼓雷鼓，其制不一。又造小扇子，皆青黃赤白色，或綉或畫，或縷金，或合色，制亦不同。」

此雖述開封習俗，但可例成都，大約相差不遠，惟不知唐世是否有之。然明人何宇度《益部談資》卷上（《學海類編集餘八遊覽》）云：「川扇不知起自何時；然李德裕有《畫桐華鳳扇賦》

云，未若繪茲禽于素扇，（按全唐文六九六，「素扇」作「珍箴」，箴即扇，楚人語。）動涼風于羅薦，則唐時此地已嘗製之矣。竹本蜀所富有，第不甚堅厚，紙則出嘉州、彭縣，輕細柔薄，惟可製扇。是其來已非一日，欲不充貢，得乎。」或者成都扇市亦始於唐歟？然此非強證也。

大抵此諸季節性之市集，雖為民間物資流通而設，而遊樂之意義亦濃，蓋蜀民好遊樂，故致愈演愈盛。陸游自蜀返越，為詩仍「多道蜀中遊樂之盛」，〔1〕大抵以吳越之繁榮，而遊樂之盛仍有不及也。

〔1〕《劍南詩集》一六有一詩題云：「鄉人或病予詩多道蜀中遊樂之盛」云云。

五、工業與商業

成都工業自漢以來向稱發達。最知名者為紡織工業。王莽時代，已稱「女工之業，覆衣天下。」〔1〕尤以織錦馳名，揚雄稱之為「奇錦」〔2〕蜀漢立國，錦為出口之大宗，故諸葛亮曰「決敵之資惟仰錦耳。」〔3〕左思《蜀都賦》曰：「闐闐之裏，伎巧之家，百室離房，機杼相和，貝錦斐成，濯色江波。」劉逵《注》引譙周《益州志》曰：「成都織錦既成，濯於江水，其文分明，勝於初成，他水濯之不如江水。」〔4〕此正就蜀漢兩晉時代而言。《隋書·地理志》述成都諸郡曰：「人多工巧，綾錦雕鏤之妙，殆侔於上國。」是歷南北朝而不衰也。

〔1〕《後漢書·列傳》三《公孫述傳》李熊說述語。按《漢書·地理志》蜀郡成都有工官。

〔2〕揚雄《蜀都賦》（全漢文五一）：「爾乃其人，自造奇錦，絃纒縹緗，繆緣盧中，發文揚采，轉代無窮。其布則細絲弱折，縣繭成疋，阿麗纖靡，避晏與陰。蛛蜘蛛絲，不可見風。篚中（文選蜀都賦注作筒中）黃潤，一端數金。」此於錦外，又見其他巧工織品。

〔3〕《御覽》八一五引《諸葛亮集》：「今民貧國虛，決敵之資唯仰錦耳。」又引《丹陽記》：「江東歷代向未有錦，而成都獨稱妙，故三國時，魏則布〔市〕於蜀，而吳亦資西道。」吳魏資蜀錦，本卷所引其他條尚有可參證者。是知錦蓋為蜀漢外貿之大宗。

〔4〕左《賦》收入《文選》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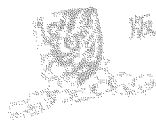
唐代蜀中久安，紡織工業自不會衰歇，人工技巧，仍與京師相侔。此由下列兩事足以徵知：其一，自唐初，宮庭供奉器物及諸公主服飾，皆由「京師及益州諸處營造。」〔1〕文宗時且「每歲於西川織造綾羅錦八千一百六十七疋」〔2〕為定額。其二，中宗寵安樂公主，尚方織百鳥毛裙，蜀川獻縷金花鳥裙，並稱精絕。〔3〕錦可謂為蜀織精品之代表作，皇甫恂使蜀，市錦半臂。杜牧《揚州詩》曰，「蜀船紅錦重。」具見他方重視為高級商貨。〔4〕故入蜀戰勝者，莫不虜掠其工巧以自利。如元和元年，高崇文伐劉闢入成都，「百工之巧，舉以自隨。」〔5〕太和三年，南詔來侵，入成都，「掠子女工技數萬，」「南詔自是工文織，與中國埒。」〔6〕又宋初平蜀，「得錦工數百人」，「置綾錦院以處之。」〔7〕是則蜀錦工巧，不但為遠國所不及，中原經唐末五代之亂，亦衰落不能與蜀比矣。

- [1] 《舊唐書》七四《馬周傳》，貞觀十年上疏。
- [2] 《舊唐書·文宗紀》太和四年條。
- [3] 《舊唐書》三七《五行志》末節：「中宗女安樂公主，有尙方織成毛裙，合百鳥之毛，正看爲一色，旁看爲一色，日中爲一色，影中爲一色，百鳥之狀，並見裙中。……蜀川獻單絲碧羅籠裙，縷金爲花鳥，細如絲髮，鳥子大如黍米，眼鼻嘴甲俱成，明目者方見之。」杜翁《奉和嚴中丞西城晚眺》（詳注一一）云：「帝念深分闕，軍須遠算縉，花羅封蛺蝶，瑞錦送麒麟。」《舊注》：「蛺蝶麒麟，縉之羅錦者，言嚴公以此入貢。」
- [4] 皇甫恂事，見《新唐書》一二五《蘇頲傳》，杜牧《詩》收入《全唐詩》第八函七冊。又羅隱《江都詩》云：「歌吹麗句秦雲咽，詩轉新題蜀錦鋪。」（全唐詩十函四冊）。《舊唐書》一一七《崔寧傳》，「（嚴）武至劍南，遣（張）獻誠奇錦珍貝，價兼百金。獻誠大悅。」皆見蜀錦爲遠方所珍。
- [5] 《舊唐書》一五一《高崇文傳》。
- [6] 《新唐書》二二二中《南蠻傳》中。
- [7] 《續通鑑長編》八乾德五年十月條。又按《舊五代史輯本》三三《唐莊宗》同光三年紀末，輯者注：「案《清異錄》，莊宗滅梁平蜀，志頗自逸，命蜀匠織十幅無縫錦爲被材，被成，賜名六合被。」此亦一事例。

其他工業顯名當世者，如雷氏製琴工藝，全國馳名。^[1]如製紙工業，薛濤賤知名最早，至五代，蜀紙爲南唐所特重，設官仿造。^[2]而最值注意，大有影響於文化發展者，則爲印刷工業。印刷術之發明，近人考論者多家，若就地方發展言之，唐末五代，西蜀印刷業當居於最顯著地位，最近秀川編《中國印刷術史話》^[3]曰：「雕版印刷發明的初期，刻印書籍大多是曆書、唱本以及佛教經典、佛像之類。印刷地點，則從陝西、河南、江西，直到四川等地區，而且長安和成都，更成爲唐朝刻書業中心。如長安東市大刁家印曆書，李家印醫書；成都樊賞家印曆書，龍池坊下家印佛經，西川過家印佛書等等。特別是成都地區，當時流行着民間自刻自印的農書、曆書、醫書、字帖等，種類很多，印數也大，傳播很廣。」到唐末黃巢義軍起時，「四川簡直成了當時刻書中心。」此乃綜合多家研究之成果而約述者。然特強調曆、農、醫、佛諸書。^[4]實則數卷數十卷之韻書、詩文集亦見西蜀印刷爲最早。^[5]至五代末期，毋昭裔更刻板印行九經，此與蜀石經之雕刻，皆爲除中央政府外，唯蜀中率先奮力爲之之壯舉；^[6]其他地區皆無聞。蜀中之所以能大規模刻印諸經者，正以其印刷工業技術爲諸方冠首也。自後歷代，西蜀皆爲雕版印刷業一大中心，^[7]事非偶然。

[1] 詳第七節文學藝術與民風。

[2] 李肇《國史補》下：「紙則有越之剡藤、苔澱，蜀之麻面、屑末、滑石、金花、長麻、魚子、十色澱，揚之六合澱，詔之竹澱，蒲之白薄重抄，臨川之滑薄；又宋毫間有織成界道絹素，謂之烏絲欄，又有繭紙。」此遍列全國有名之紙，而蜀似特多。又李匡乂《資暇集》下，「松花澱，代以爲薛濤澱，誤也。松花澱，其來舊矣。元和初薛濤尙斯色，而好製小詩，惜其幅大，不欲長，乃命匠人狹小之。蜀中才子既以爲便。後減諸澱亦如是，特名曰薛濤澱。」此澱之名久爲人所悉。又陳師道《後山叢談》卷一云：「南唐於饒置墨務，歙置硯務，蜀置紙務，各有官。……求紙工於蜀中。主好蜀紙，既得蜀工，使行境內，而六合之水與蜀



同。」按此蜀蓋小地名，在六合，殆與蜀江、蜀岡有關。是蜀中造紙技術傳至長江下游也。至末世，西蜀製紙工業，可參看費著《蜀牋譜》。

- [3] 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出版，1977年。
- [4] 馮宿《禁版印時憲書奏》（全唐文六二四）：「準敕禁斷印歷日版。劍南兩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歷日鬻於市，每歲司天台未奏頒下新歷，其印歷已滿天下，有乖敬授之道。」按《舊書·馮宿傳》，以開成元年卒，是唐中葉人。其時劍南已與淮南，即成都與揚州已每年大量版印日歷，販滿天下。此似為蜀中印曆最早見之一條史料，亦為中國印刷史上最早最明顯可信之史料。又《冊府元龜》六〇八學校部、刊校目，後唐宰相馮道、李愚奏請雕摹經典疏中有云：「嘗見吳蜀之人，鬻印板文字，色類絕多，終不及經典。」按此奏上於長興三年。是地方雕板印書始終以西蜀、淮南（吳即淮南）為盛也。
- [5] 日僧宗叡《請來法門目錄》有「西川印子《唐韻》一部五卷，同印子《玉篇》一部三十卷。」目錄以大唐咸通六年寫。（引見鄧嗣禹：中國印刷術之發明及西傳，圖書評論二卷十一期。）又釋曇域《禪月集序》，（全唐文九二二）云：禪月以壬申歲十二月寂，「衆請曇域編集前後所製歌詩，……遂尋檢葉草及暗記憶者，約一千首，乃雕刻成部，題號《禪月集》。」……「時大蜀乾德五年癸未歲十二月十五日序。」是數卷數十卷之韻書、詩文集，亦得雕板印行，而淮南、揚吳則無聞，蓋揚州經亂已衰之故。
- [6] 《通鑑》二九一後周廣順三年紀云：「自唐末以來，所在學校廢絕，蜀毋昭裔出私財百萬營學館，且請刻板印九經。蜀主從之。」按唐開成石經，後唐長興石經，與雕板印經諸事，皆為人所共知，不詳論。
- [7] 葉夢得《石林燕語》卷八：「今天下印書，以杭州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師比歲印板，殆不減杭州，但紙不佳。蜀與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幾遍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是北宋時代，西蜀仍為刻書一大中心。又明謝肇淛《五雜俎》卷一三：「宋時刻本，以杭州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今杭刻不足稱矣。金陵、新安、吳興三地剞刻之精者不下宋板。楚、蜀之刻皆尋常耳。閩建陽有書坊，出書最多，而板紙俱最濫惡。」是明代蜀刻雖已衰，但仍不失為一中心。

就商業言，成都既為中國西南縱橫數千里間之政治、軍事、經濟、交通、文化中心，其商業發達亦為必然之結果。蓋本土物資豐富，又為西南邊徼內外諸落後民族之物資集散地，而北通關中，東通荆吳，皆達中原，南通雲貴，達於交、廣，西南徼外通緬甸、印度，西北循岷江、白水上源通隴西，外達西藏、西域。具有物資上交通上如此之有利形勢，故自秦漢以來，蜀賈之向外活動與外商之來蜀活動，歷見史冊，甚堪注目。如《史記·西南夷傳》云：

「夜郎……滇……邛都……嵩、昆明、徙、笮都……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秦時……諸此國頗置吏焉。……漢興，皆棄此國而開（王念孫曰當從漢書作關）蜀故徼。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笮馬、犍僮、髦牛，（漢書作旄牛，是亦族名。）以此巴蜀殷富。建元六年……唐蒙……曉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醬。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牂柯江……出番禺城下。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柯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同師。……及元狩元年，……張騫使大夏來，言居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使問所從來，曰

從東南身毒國，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
即此一篇，已見漢代蜀之賈人不但北賈京師，近賈邊徼笮、僂、旄諸夷，亦見南賈夜郎至嶺南，〔1〕西南賈印度至中亞，〔2〕到處活躍。

〔1〕漢代通夜郎有東西兩道，東道由符縣巴符關入，縣關在今四川合江縣西南；西道由夔道縣入，縣在今宜賓、慶符兩縣間；並詳拙作《漢唐時代川滇東道考》（總統蔣公逝世周年紀念論文集，中央研究院。）《華陽國志》四《南中志》南廣郡條：「自夔道至朱提（今昭通縣）有水步道。水道有黑水及羊官水，至險難行；步道渡三津，亦險阻。故行人為語曰，猶溪、赤木（鄭注作水），盤蛇七里，盤羊為橈，氣與天通，看都護泚，住往呼尹〔伊〕，康降賈子，左儻〔擔〕七里。又有牛叩頭、馬搏頰（原缺頰，據鄭注補）坂。其險如此。」是此道亦必有商賈來往不少。

〔2〕《三國志》三〇《烏丸鮮卑東夷傳》末，裴《注》引魏畧《西戎傳》曰：「盤越國一名漢越王，在天竺東南數千里，與益部相近。其人小，與中國人等，蜀人賈似至焉。……又今《西域舊圖》云，……大秦道既從海北陸通，又循海而南，與交趾七郡外夷比，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異物。」此可與《史》、《漢》之《西南夷傳》相參證，且西至大秦也。

六朝時代，西北「賈胡在蜀」者不少，何妥之父西域細脚胡，「通商入蜀」，「事梁武陵王紀，主知金帛」，「號為西州大賈」，此為一顯例。西北諸胡入蜀，大抵取道建都於青海湖附近之河南國（吐谷渾）。河南國「與益州鄰，常通商賈」，且與南方朝廷交往頗繁，請於益州立九層佛寺，足徵其在益州商賈之利益，蜀人「慕其利，多往從之」，必亦多從事商販者。〔1〕又蜀之南境，經雲南通天竺之道亦暢通，僧侶取途於此者甚多，商賈亦必由之。〔2〕凡此皆足徵六朝時代，成都在對外貿易上之地位，則傳說中之成都大秦寺，殆不盡虛：〔3〕而梁武陵王紀為益州刺史，「外通商賈遠方之利」，而以西域賈胡主其事，故能聚黃金萬斤，他物稱是，〔4〕殆亦非專取當地民膏也。

〔1〕《南齊書》五九《芮芮傳》：「芮芮常由河南道而抵益州。」「建元……二年，三年……獻師子皮袴褶，……時有賈胡在蜀見之，云此非師子皮，乃扶拔皮也。」又《梁書》五四《西北諸戎傳》，河南王者，「天監十三年，遣使獻金裝馬腦鍾二口；又表於益州立九層佛寺，詔許焉。……其使或歲再三至，或再歲一至。其地與益州隣，常通商賈，民慕其利，多往從之，教其書記。」按河南即吐谷渾，建都於青海湖附近，參稽南朝各史西北諸國傳，其通南朝無不取道吐渾。如滑國，車師之別種，屢次遣使來獻，「其言語待河南人譯然後通。」此即顯例。道吐渾，即至益州，故蜀中往往有商胡，河南王且請在益州立佛寺，疑其人留蜀者不少，（在他國造寺，多即為本國僧人留學他國而備者，見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觀貨羅僧寺條。）更遠之商胡亦至。

何妥之父事見《隋書》七五《儒林·何妥傳》：「西城人也，父細胡，通商入蜀，遂家郫縣，事梁武陵王紀，主知金帛，因致巨富，號為西州大賈。」《北史》八二《儒林·何妥傳》，「細胡」作「細脚胡」。《標點本校記》，「《通志》一七四，城作域，按何妥先世當為西域何國人，疑《通志》為是。」蓋《隋書》、《北史》宋本原作「域」。是西域胡人經商於蜀，且為地方政府主知金帛，更致大富。此尤為商胡在蜀之顯例；然決非孤立之例。《宋書》四五《劉粹傳附道濟傳》，宋初為益州刺史，「遠方商人多至蜀土，資貨或有直數百萬者。」所謂遠方商人當兼指國內外而言，胡商自亦在其中。

〔2〕義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上：天竺「有一故寺，但有塼基，厥號支那寺。古者相傳，

云是昔室利笈多大王為支那國僧所造。于時有唐僧二十許人從蜀川梓戩道而出，向莫訶菩提禮拜，王見敬重，遂施此地以充停息，……準量支那寺，至今可五百餘年矣。」此殆兩晉或南朝早期事，蜀川梓戩道即前段注〔1〕所引《華陽志》之庾隆賈子道，由川南向西南通印度也。僧侶行旅例隨商隊，玄奘被推為大商主，最為顯例。

- 〔3〕吳曾《能改齋漫錄》七杜石筍行條：「趙清獻《蜀郡故事》石筍在衙西門外，二株雙躡，云真珠樓基也。昔有胡人於此立寺，為大秦寺，其門樓十間，皆以真珠翠碧貫之為簾，後摧毀墜地，至今基腳在，每有大雨，其前後人多拾得真珠瑟瑟，金翠異物。……蓋大秦國多瑇瑁琅玕，明珠夜光璧，水道通益州永昌郡，……則此寺大秦國人所建也。」按大秦寺傳說不知始於何時，若誠有其事，必在唐以前，非無可能也。
- 〔4〕《南史》五三《梁武陵王紀傳》，及見前注〔1〕引《隋書·何妥傳》。又《續高僧傳》二六《釋道仙傳》，「本康居國人，以遊賈為業。梁國之際，往來吳蜀，江海上下，集積珠寶，故其所獲貨貨乃滿兩船……值錢數十萬貫。……行賈達于梓州新城郡牛頭山……。」是亦胡商在蜀之一例。

唐代南北統一，西域賈胡，直至長安為便，成都西北通隴右、青海之道極險阻，胡商逕至成都者蓋視南朝為少。〔1〕然吐蕃仍力求與益州通市，雖唐室懼其侵陵而不許；然劍南西山唐蕃間之通道甚多，如茂州（今茂縣）西有維州（舊理番縣）之滴博嶺道與平戎城（約北緯32°東經103°稍東）之蓬婆嶺道，雅州（今雅安）西有靈關（今蘆山縣西北六十里）、和川（今天全縣稍東）、始陽（循榮經水）三道，故交通並不太困難，走私貿易勢不能免。〔2〕至於西南經南詔，南通交州及支那半島諸國，西通印度諸國，皆有著名之大道，商人來往自不能盡禁。〔3〕故蜀中奇貨，除土產錦綺之外，又特有珍奇者，殆多由南路商貿所致也。〔4〕至於近徼諸落後民族地區，特與益州商貿為生命線又不待言。

- 〔1〕亦非絕無其人。如義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上，「佛陀達摩者，即覲貨速利國人也，……少因興易，遂屆神州，云於益府出家。」足立喜六注：「興易即商賣」是也。此即一例。
- 〔2〕《通鑑》二〇五萬歲通天元年紀，《考異》引《御史台記》：「論欽陵必欲得四鎮及益州通市乃和親，朝廷不許。」足見益州通市對於吐蕃之重要。《新唐書》二一六上《吐蕃傳》上，「吐蕃又請交馬於赤嶺，互市於甘松嶺。宰相裴光庭曰：甘松中國阻，不如許赤嶺。乃聽以赤嶺為界……。」時在開元中。按甘松嶺在松州西北三百里，而松州有驛道南達成都（參看唐代岷山雪嶺地區交通圖考，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二卷一期。）是其企圖仍在與益州通市也。陳子昂《諫雅州討生羌書》（全唐文二一二）曰：「臣聞吐蕃羯虜，受蜀之珍富，欲盜之有日矣。」可見雖禁之，而仍獲得蜀貨，蓋走私貿易，實難以政治方法所能阻止也。其茂州兩道，詳拙作《唐代茂州西通吐蕃兩道考》（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一卷）；雅州三道，詳拙作《唐代雅州西通徼外三道考》（董作賓先生逝世十四周年紀念刊，藝文印書館）。
- 〔3〕成都南通南詔有東西兩大道，詳拙作《唐代成都清溪南詔道驛程考》（唐史研究叢稿第七篇）及《漢唐時代川滇東道考》（總統蔣公逝世周年紀念論文集，中央研究院）。南詔東通交趾，西通印度之大道，即《新唐書·地理志》七下附記通四夷七道中之第六安南通天竺道，詳伯希和《交廣印度兩道考》（馮譯本，台灣商務印書館）及拙作《唐代滇越通道辨》（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八卷一期），有此兩道交通，商旅來往自甚易。《新修本草》一五酪蘇條云：「蘇出外國，亦從益州來。」此為唐初一例。又如下文引《南唐書》客持蜀鳳

頭事，為唐末五代一例。料通隋唐五代，當不少此類商業活動也。

- [4] 《舊唐書》一九〇中《文苑·陳子昂傳》，疏云：「蜀為西南一都會，國家之寶庫，天下珍貨聚出其中。」李貽孫《夔州都督府記》（全唐文五四四），「蜀都之奇貨。」《通鑑》二七三後唐同光二年紀，「蜀法，禁錦綺珍奇不得入中國。」（蜀檣杵上，「唐莊宗遣李稠來通好，市珍玩錦繡，衍不許。」即一事。）是錦綺之外另有珍奇，殆珍寶之屬，實非蜀本土所產。《南唐書》三八《梁王徐知諤傳》：「知諤博採奇物寶貨充牣其家。有蜀客持鳳頭至，自言得於南蠻賈者，知諤以錢五十萬易之。」此其一例。

蜀中本土富庶，工業發達，又因西南徼外通商之利，多致珍奇異貨，故京師中原，多所取給，故杜翁進《論巴蜀安危表》云：「瓊林諸庫仰給最多。」〔1〕及五代王蜀偏霸獨立，中原朝廷仍欲「通好，市珍玩錦繡」也。〔2〕至於外地商人來蜀從事貿易者自復不少。〔3〕而蜀商亦見活躍於全國各地之市場。如武后時，長安蜀商至能參與內殿賜宴，〔4〕王建吟詩，至以蜀商為入邊商人之代表〔5〕盧綸稱永州（今湖南零陵）「浪裏爭迎三蜀貨」〔6〕杜牧詠揚州之盛云：「蜀船紅錦重」〔7〕皆見蜀商在國內廣泛活躍之情形，不但東至長江下游最大都市之揚州，北至國都長安，有其經濟勢力，即湖南南境州縣及西北邊遠地區，亦有蜀商之踪跡。而江陵有甚多巴蜀人寓居，蓋即因經商羈旅而定住者。〔8〕至宋世，蜀商益見活躍於長江中下游，陸游至稱鄂州「四方商賈所集，而蜀人為多。」〔9〕且有南踰五嶺至濱海之欽州，與安南大賈從事巨額貿易者。〔10〕顯為承沿唐代之情勢而繼續發展也。

〔1〕杜甫《為閬州王使君進論巴蜀安危表》（全唐文三五九），前文已詳引。

〔2〕《蜀檣杵》卷上：「唐莊宗遣李稠來通好，市珍玩錦繡。衍不許。」又《通鑑》二七三後唐同光二年紀。

〔3〕張籍《賈客樂》：「金陵向西賈客多，船中生長樂風波，……停杯共說遠行期，入蜀經蠻誰（一作遠）別離。」（全唐詩五函六冊張集一）足見商賈入蜀者不少。《益州名畫錄》卷中之廣玄、李文才、杜敬安、阮惟德諸條皆言荆湖淮南商賈入蜀，請其繪畫，將歸本道。引詳本文第七節繪畫條。其見長江中下游商人入蜀從事商業行為者之多。

〔4〕《舊》九二《韋安石傳》：「嘗於內殿賜宴，（張）易之引蜀商宋翦子等數人於前博戲。安石疏奏曰，蜀商等賤類，不合預登此筵。」

〔5〕王建《送人》：「蜀客多積貨，邊人易封侯。」（全唐詩五函五冊王集一）按此詩泛云「送人」，非送人入蜀。又起句云：「白日向西沒，黃河復東流」，末收云「與君俱絕蹟，兩念無因由。」參以邊人句，（宋代視四川為邊遠，唐代無此觀念。）似在西北邊區，送人亦之邊遠地方，而詩云「蜀客多積貨」，足見蜀商在邊地極為活躍有名。至於劉禹錫《竹枝詞》云：「日出三竿春霧消，江頭蜀客駐蘭橈，憑（一作欲）寄狂夫書一紙，家住成都萬里橋。」（全唐詩六函三冊，劉集一二）時在夔州，於成都為近，其成都商人之多，自不待言。

〔6〕盧綸《送從叔牧永州》云：「浪裏爭迎三蜀貨，月中喧泊九江船。」（全唐詩五函二冊盧集一）。

〔7〕杜牧《揚州詩》，（全唐詩八函七冊）

〔8〕王建《江陵即事》云：「蜀女下沙迎水客，巴童榜驛賣山雞。」（全唐詩五函五冊建集四）此見巴蜀人羈寓江陵、做小生意者不少。

〔9〕蘇軾《荊州》十首云：「北客隨南賈，吳檣間蜀船。」（東坡續集二，萬有本）此見荊州

爲吳蜀商船交會地。范成大《吳船錄》下：「至鄂渚……沿江萬家，……列肆如櫛，酒壚樓欄尤壯麗，外郡未見其比，蓋川、廣、荆、襄、淮、浙貿遷之會。」此狀鄂州，尙未特見蜀商之多。陸游《入蜀記》五，記鄂州云：「由江濱堤上還船，民居市肆，數里不絕，……蓋四方商賈所集，而蜀人爲多。」此更見蜀商爲特多。同書卷四又云：「次蘄口鎮，居民繁錯，蜀舟泊岸下甚衆。」此爲鄂州以東，今蘄春縣西三十里之一鎮，亦多蜀船如此，足見蜀商之活躍。檢全漢昇《南宋杭州的消費與外地商品之輸入》（中國經濟史論叢第一冊），引《西湖老人繁盛錄》，有「川廣生藥市」。此外尙有可考者。《嘉定鎮江志》六《地理志》山水篇丹徒縣條云：「國賦所貢，……與夫蠻商蜀賈，荆湖閩廣江淮之舟，湊江津，入漕渠，而徑至行在所。」則蜀買來臨安營業者必甚多，殆如唐世之在揚州也。

[10]《嶺外代答》五，欽州博易場條：「凡交趾生之具悉仰於欽，舟楫往來不絕也。博易場在城外江東驛。……其國富商來博易者，必自其邊永安州移牒于欽，謂之小綱。其國遣使來欽，因以博易，謂之大綱。所賚乃金、銀、銅錢、沉香、光香、熟香、生香、眞珠、象齒、犀角。吾之……富商，自蜀販錦至欽，自欽易香至蜀，歲一往返。每博易動數千緡，各以其貨互絨，踰時而價始定。」按此乃蜀商以錦繡，安南商人以香藥珍異相互從事國際貿易也。下文云，爲了議價，「吾之富商又日遣其徒爲小商以自給，而築室反耕以老之。」更明「吾之富商」乃蜀人，非欽州本地商人也。

六、寺觀與佛道兩教

成都古蹟之有關歷史文化最負盛名者：有《文翁講堂》，在城南夷里橋南道東，「構制雖古，而巧異特奇。」然已非漢初舊址。^[1]相如琴台在州西四里市橋之西，笮橋之北。^[2]子雲宅一名草玄堂，在城西南角。^[3]武侯祠在成都縣南十里。^[4]工部草堂在城西草堂寺之西，浣花溪西頭百花潭。^[5]江濱祠在縣南八里。^[6]此皆歷代志書多所記述者，今不詳論。而唐代益州佛道兩教皆盛，寺觀甚多，影響當時民風藝術亦甚大，茲特表而出之。

[1]《華陽國志》三《蜀志》，《元和志》三一成都府目，《寰宇記》七二益州目。

[2]《寰宇記》七二及《蜀中廣記》二。《寰宇記》作「笮橋下」誤；《廣記》作「笮橋北」，是也。

[3]《寰宇記》七二。而《蜀中廣記》三述成都北門之勝有子雲宅，則後世遷徙者。

[4]《元和志》，先主廟在成都縣南十里；而《寰宇記》云，先主祠在府南八里，武侯祠在先帝廟西，相近又有關羽祠，張飛祠。

[5]《寰宇記》七二，及《蜀中廣記》二。參看後文草堂寺條。

[6]《元和志》作縣南八里；《寰宇記》作「縣南上四里。」引漢郊祀志云秦置。

成都名寺甚多，據《益州名畫錄》所記，唐五代有大聖慈、聖壽、淨衆、草堂、寶曆、昭覺、龍興、中興、聖興、福感、資福、應天、四天王、金華、寧蜀、翠微等十六寺及福慶禪院。^[1]

[1]宋黃休復《益州名畫錄》三卷，所見成都寺名甚多，如大聖慈寺四十一見，聖壽寺十四見，淨衆、寶曆寺各五見，昭覺、龍興、中興寺各四見，聖興寺三見，應天、福感、資福、四天王寺各二見，金華、寧蜀、翠微、草堂寺及福慶禪院各一見。按黃休復爲宋初人，李暉

《序》又以景德二年作，稱其錄「自李唐乾元初至皇宋乾德歲」，則所記十七寺院皆宋以前之名寺也。

大聖慈寺 在府治之東，為東門之盛，清址在府城內，華陽縣治東。^[1]唐至德年，玄宗在蜀時所建，「御書大聖慈寺額，賜田一千畝，勅新羅金禪師為立規制，凡九十六院，八千五百區（間）。」^[2]故規模極大，為成都諸寺之最。以其額為玄宗御書，故會昌毀佛，此寺獨存，^[3]李之純《大聖慈寺畫記》云，「舉天下之言唐畫者，莫如成都之多；就成都較之，莫如大聖慈寺之盛。」^[4]蓋寺未中毀，不但諸跡保存，且得兼收他寺藝品也。^[5]

[1] 《蜀中廣記》二，大慈寺為成都東門之勝之一。注[2]引《佛祖統記》在府東。《一統志》成都府卷《寺觀目》，在華陽縣東，而同卷《祠廟目》，章阜祠「在府城內大慈寺。」唐世當在高駢大城之內歟？

[2] 宋釋志磐《佛祖統記》卷四〇至德元載條云：「上皇駐蹕成都，內侍高力士奏，城南市有僧英幹於廣衢施粥，以救貧餓，……欲於府東立寺為國崇福。上皇說，御書大聖慈寺額，賜田」云云。《蜀中廣記》二引《通志》云「舊有肅宗書大聖慈寺四字」，實誤。志磐述此寺規模頗扼要，其詳見注[4]引李之純《大聖慈寺畫記》。《佛祖統記》同條續云：「全[金]後往池州九華山坐逝，全身不壞，骨如金鑽，壽九十九。」似即地藏。然余仍疑其非一人，詳拙作《新羅留唐學生與僧徒》（《唐史研究叢稿第九篇》）。

[3] 《蜀中廣記》二大慈寺條引《通志》，「大聖慈寺四字蓋勅賜也，故會昌不在除毀之例。」又淨衆寺條亦見大慈寺未被毀。

[4] 李氏《畫記》（成都文類卷四五）此語之下，云親自督導清點大慈寺之建築單位與圖繪云：「總九十六院，樓閣殿塔廳堂房廡無慮八千五百二十四間，畫諸佛如來一千二百十五，菩薩一萬四百八十八，帝釋梵王六十八，羅漢祖僧一千七百八十五，天王明王大神將二百六十二，佛會經驗變相一百五十八，諸夾神雕塑者不與焉。……其鑄象以銅，刻經以石，又不可概舉，……自至德以後，寫從官府尹監司而下僚屬真，迨於今日三百九十人。……」

此記大慈寺規制壁畫最詳，古今寺院之盛殆少可與比者，故詳錄之。

[5] 郭若虛《圖畫聞見誌》五會昌廢壁條「唐李德裕鎮浙西日，於潤州建功德佛宇，曰甘露寺。當會昌廢毀之際，奏請獨存，因盡取管內廢寺中名賢畫壁置之甘露，乃晉顧凱之、戴安道，宋謝靈運、陸探微，梁張僧繇，隋展子虔，唐韓幹、吳道子畫。」蓋寺有特存者，附近廢毀諸寺，其壁畫寶物部份歸之特存之寺，亦事勢所必然者。《蜀中廣記》二西門之勝淨衆寺條，「寺有一巨鐘，重千鈞，會昌例毀，此鐘乃移入大慈。大中復還。」可想見他寺藝品器物因會昌毀佛而移入大慈寺者必不少，淨衆得重建，故鐘復還本寺，其未重建者，必歸大慈無疑。

聖壽寺 本古龍淵寺，隋更名空慧寺。在城西南石牛門市橋處，俗稱石牛寺、石犀寺。^[1]元和二年勅於成都府置聖壽寺，在萬里橋之南。^[2]會昌中，兩寺皆毀。大中元年，李回於空慧寺舊址重建一寺，摹聖壽寺額豎此，僖宗更御書之，然非元和聖壽故寺也。^[3]^[4]

[1] 《蜀中廣記》一南門之勝石犀寺條云，一名石牛寺，在城西南石牛門市橋處，以李冰沉石犀於此，故名，「然額曰聖壽寺，古之龍淵寺也，迺晉王羽宅，後捨為寺，改名龍淵。……《高僧傳》，晉惠持到蜀，止金淵精舍是矣。其後改名空慧。隋賜蜀王秀竹園六十頃，此地

屬焉。唐儀鳳二年，勅天下七寺建塔立石柱二，度僧嘗〔常〕七百人，此其一也。會昌中廢。至大中元年，李回重建，摹萬里橋南元和聖壽寺額豎此，故曰聖壽寺，字則僖宗御書也。」是此寺本名龍淵，隋迄唐中葉，見名空慧，大中重建始易名聖壽，石犀、石牛蓋其俗名。《寶刻類編》二，成都有《大周空慧寺鐘銘》，證聖元年立。同書三，成都有《空慧寺講華嚴經碑》，開元十五年立。時代皆相合。按《續高僧傳》卷九有《隋益州龍淵寺釋智方傳》，云寺在州郭；卷二〇有《唐益州空慧寺釋慧照傳》，云寺在州南。又道宣《神州塔寺三寶感通錄》卷上，有益州城南空慧寺；《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一，玄奘至成都，住空慧寺。凡此皆可與《廣記》相印證，其改名空慧當即在隋世。

〔2〕《唐會要》四八《寺目》，元和二年九月，勅「成都府宜置聖壽、南平二寺。」此必即注〔1〕所引《廣記》云萬里橋南之聖壽寺也。

〔3〕此參〔1〕〔2〕兩注已明。然嘉慶《四川通志》三八《寺觀目》：空慧寺，孟蜀宰相王處回捨宅廣其基。大中祥符間移聖壽額於此。與《廣記》移額年世不同。按《名畫錄》屢及唐末五代聖壽寺繪事，而不見空慧之名，《宋高僧傳》亦不見會昌以後之空慧寺名，疑當從《廣記》。《一統志》成都府卷《寺觀目》，聖壽寺「唐為空慧寺，後改龍淵，宋大中祥符間改今名。」後改龍淵，尤誤。

〔4〕按唐代各地寺名往往遷徙改復不定，即以此寺而言，上文所見已有分歧。復考《宋高僧傳》——《唐伏牛山自在傳》附《成都府元和聖壽寺釋南印傳》，「印自江陵入蜀，於蜀江之南壩，雜草結茆，衆皆歸仰，漸成佛宇，貞元初年也。高司空崇文平劉闢之後，改此寺為元和聖壽，初名寶應也。印化緣將畢，於長慶初……入滅，營塔於寺中。會昌中毀塔。大中復於江北寶應舊基上創此寺，還名聖壽。」則聖壽又為寶應之易名。然此節所述，有極未明處。據前數句，南印始在蜀江之南建寶應寺，元和初改名元和聖壽寺，仍應在江南，至會昌寺毀也；而下文云「大中復於江北寶應舊基上創此寺，還名聖壽」，則似會昌毀寺時已在江北；又其寺早已更名聖壽，何云寶應舊基？又何云還名聖壽耶？凡此諸問題，皆難詳考，姑不深究。

淨衆寺 本南朝安浦寺，唐重建易名，在城西笮橋門之西，今成都西門外約半里處〔1〕。開元中，新羅僧無相住此，為宗密所稱禪門七家之第二家；其弟子無住為第三家；而禪門最盛之江西馬祖為第四家，亦出於無相；故此寺在唐代禪宗史上居於極重要之地位。按無相亦姓金，與大慈寺金禪師時代畧相近。其時成都兩個最有名之和尚皆為新羅金姓，亦一異也。〔2〕又近百年來，其舊址屢次出土石雕佛像，自南朝至唐代數百軀。唐代造像具寫實自然之美，望之絕如活人，實為中國雕刻藝術史上難得之珍品。〔3〕此寺在禪宗史上與藝術史上皆居於極重要地位，是不但為當時亦且為歷史上之一名寺也。

〔1〕《寶刻類編》四，成都有《淨衆寺修律院記》，許李同撰，貞元十八年四月立。疑「象」為「衆」之譌。同書八，成都有《再建立淨衆寺碑誌共五所記》，僧了之撰，景福二年七月立。同書七，成都有《修淨衆寺碑》，劉曦度撰，後蜀廣政四年立。《蜀中廣記》二，成都西門之勝有笮橋、淨衆寺等。出笮橋門而西即至淨衆寺，宋改名淨因寺，明名萬佛寺。嘉慶《四川通志》三八《寺觀目》。淨衆寺在縣西北，唐開元十六年，新羅國僧無相募建。」據注〔3〕引《成都萬佛寺石刻藝術》出土資料，南朝寺名安浦，唐蓋於舊址重建者。其地在今成都西門外萬佛橋附近，去城約半里。

〔2〕此段述事，參詳拙作《新羅留唐學生與僧徒》（唐史研究叢稿第九篇）禪宗之無相與益州金曇師兩條。又《宋高僧傳》卷一九有《唐成都淨衆寺無相傳》，卷九有《唐成都淨衆寺神

會傳》(無相弟子)，卷二二有《周僞蜀淨衆寺僧滅傳》，高僧之多，亦見此寺在唐代佛教界之地位。

[3] 唐淨衆寺，宋更名淨因寺，明名萬佛寺，明末毀於兵火。近百年來，成都西門外距城約半里處萬佛橋附近，屢次出土石刻雕像，多大如人體。1953年建設工程中，一次出土二百餘件，及前此出土之仍存者，並藏於四川省博物館。劉志遠、劉廷璧據此批材料，編爲《成都萬佛寺石刻藝術》一書。(1958年，中國古典藝術出版社)其造像有紀年者，自梁武帝普通四年(公元523)至中大同三年(公元549)五軀，北周兩軀，唐開元十六年(公元728)二十五年兩軀，宣宗大中元年(公元847)一軀；而清光緒八年(公元1882)出土之劉宋文帝元嘉二年(公元425)一刻爲最早，惜已外藏法國。據梁武帝中大通元年造像，此寺原名安浦寺；唐淨衆寺蓋就安浦舊址重建者。在此批石刻雕像出土以前，南朝石刻造像甚少見，就四川言，雖石刻雕像甚多，而且往往規模宏大，但時代不能早過唐代；淨衆寺廢址出土造像，自南朝至晚唐，既可補南朝石像藝術之缺，又見南北佛雕藝術融和之痕跡，故在藝術史上，至可寶貴，具詳原文。大抵南朝後期至唐代所造各像，皆以寫實自然生動爲主，不專重壯嚴神化氣氛，尤其如圖版44唐雕菩薩頭像，形像圓潤，眉目生動，絕如一位性情溫和的活人照片，真正難能可貴。

草堂寺 在府西七里，爲南朝以來之古寺。〔1〕天寶末、至德中，無相大師居此，〔2〕旋又有杜翁草堂與相近，〔3〕亦增加其知名度。唐代劍南軍政長官多有畫像於此，圖繪逼真，「代稱絕跡」。〔4〕

[1] 《益州名畫錄》卷下附載李德裕《重寫前益州五長史真記》云：「益州草堂寺列畫前長史一十四人，代稱絕跡。余嘗于數公子孫之家獲見圖狀，乃知草堂續事，靡不造真……妙畫神照，……乃選其功德尤著五人，模于郡之廳所。」大和四年閏十二月十八日記。本注：「《成都記》云，寺在府西七里，去浣花亭三里。」《一統志》成都府卷《寺觀目》，在成都縣西五里。按《蜀中廣記》二引《文選注》，南朝已有此寺。考《續高僧傳》二五(大正藏)《釋德上傳》云：「時益州草堂寺旭上者，……少居草堂」云云。時在唐初或稍前。則此寺創興，果當在南朝也。又按唐代益州先爲大都督府，長官曰長史，後爲成都府，長官曰尹，皆爲劍南一方之軍政長官。檢吳廷燮《唐方鎮表》六，李德裕以前十四人，則除少數或未履任，或任期短暫及其他事故外，大抵皆有繪真於此寺。

[2] 段文昌《菩提寺置立記》(全唐文六一七)，「蜀城正南，當二江合流之上……獨有岡阜……至德二年，長史盧公元裕奏置此寺。……先是僧衆鄉黨耆舊，相厥林野，……漠然無所，乃諭於草堂寺無相大師以質之。大師傳繼七祖，於坐得三昧，以石思議之知見，破羣心之蒙惑，遂指此地，宜開法門。……大師一言，而天心感悅，故得廣輪棟宇，版築垣牆。」按天心指玄宗。又按五祖弘忍傳智詵，詵傳無相，故爲七祖，深得成都上下尊仰，後建淨衆寺而居焉。據此《記》，原在草堂寺也。

[3] 《一統志》成都府卷《寺觀目》梵安寺即草堂寺，「與杜甫草堂相接。」按杜翁《卜居》詩云：「浣花溪水水西頭，主人爲卜林塘幽。」《狂夫》詩云：「萬里橋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滄浪。」《西郊》詩云：「時出碧雞坊，西郊向草堂。」(詳注九)檢《蜀中廣記》三，「碧雞坊在城之西南」。《元和志》三一，成都縣，萬里橋在縣南八里。《寰宇記》七二益州成都，「杜甫宅在郭西外，地屬犀浦縣。浣花溪地有百花潭。」據此推求，杜翁草堂當在城西南草堂寺之西。《一統志》成都府卷《古蹟目》謂在成都縣西南五里。

[4] 已詳注〔1〕條。

寶曆寺 德宗貞元末韋皋所建，在府城東南江水之南；〔1〕與萬里橋相近。〔2〕昭宗乾寧



二年重修。^[3]

- [1] 韋臯有《寶曆寺記》（全唐文四五三），自述建此寺時「守司西蜀向二十載」，「於府之東南擇勝地建仁祠，號曰寶歷。」又云「涉江而南，相彼原阜」，並「架雙橋」以通之。是寺在城東南江水之南。《輿地碑記目》四，成都府有《靈市記碑》，韋南康文，在華陽縣寶曆寺。寺有南康像，最得其真。
- [2] 《宋高僧傳》二七《唐雅州智廣傳》云，咸通中，寺在城北，似會昌倒毀之後易地重建者。然《學海類編集餘》五收宋人陳元觀《歲時廣記》卷一《遊蜀江條》述二月二日踏青節，張詠是日出萬里橋，爲綵舫遊江，「抵寶歷寺橋，出譙於寺內，……薄暮方歸。」又《集餘》八收宋人費著《成都遊宴記》，畧同。則寺仍在城南，《僧傳》「北」字蓋誤。
- [3] 《錦里耆舊傳》五。又《寶刻類編》八有馮涓撰《重起寶歷寺碑》，廣政十四年，在成都。似五代末又重修。

昭覺寺 在城北昇仙橋之北，^[1]去城十五里。^[2]本名建元。僖宗乾符中休夢禪師自京師來錫，勅改昭覺。僖宗幸蜀，甚禮之，王建尤相親重，後蜀君主亦屢來幸，故歷兩蜀至宋初，寺之規制日宏，亦晚唐以來蜀中一名寺。^[3]

- [1] 《蜀中廣記》三。按《寶刻類編》六，成都有《昭覺寺記》，蕭道撰，中和五年正月立。此爲此寺最早之物證。
- [2] 《四川通志》《寺觀目》。
- [3] 李旼《重修昭覺寺記》（成都文類三七、宋代蜀文輯存四）記此寺歷史及資財規制極詳；文長不錄。其「寺之勝蹟，有僖宗幸蜀《放隨駕進士三榜題名記》，陳太師塑六祖像，蕭相國（遘）文《建寺碑》，會稽孫位書行道大王，浮邱先生松竹，張南本畫水月觀音，翰林待詔（失姓氏今寺額始自長安降到）摸昭覺寺額，經亂不亡，爲唐故事。」觀此數項古蹟，足見此寺在唐末已極有地位。與前蜀王氏之關係，亦見李旼《記》，後蜀王室屢幸寺，見《蜀檣杌》下。

龍興寺 本名正覺寺，在城西浣花。^[1]神龍元年詔諸州置中興寺，旋以其名未妥，更名龍興，^[2]益州所建則正覺舊址也。

- [1] 《益州名畫錄》卷下，「浣花龍興寺，《成都記》云本正覺寺。」則在城西浣花。
- [2] 《唐會要》四八《寺目》龍興寺條，神龍元年，詔天下諸州各置一大唐中興寺觀。因張景源諫，改爲龍興寺。而《佛祖統統》四〇，開元二十六年，勅天下諸郡立龍興、開元二寺。建置年份不同，今從會要。按《輿地碑記目》四，成都府有《龍興寺碑》，《容齋隨筆》云前蜀王氏時立。

中興寺 在少城西南角，內有揚子雲墨池。^[1]

- [1] 《蜀中廣記》三：「袁說友《成都文類》云，益州中興寺內有墨池，揚子雲讀書處，畫像存焉。《圖經》云，中興寺有子雲載酒亭是矣。《成都記》云，唐高僧智浩嘗於中興寺誦《法華經》。」按《寰宇記》七二益州成都縣，「子雲宅在少城西南角，一名草玄堂。」又《蜀中廣記》三：「何涉《讀易堂記》云，揚雄有宅一區，在錦官西郭隘巷，著書墨池在焉。按今在藩司西南隅，屬城之北，與郡縣俱移來者。」是唐有中興寺，內有子雲墨池，在少城西南角；明代墨池在城北，非舊地也。又按此中興寺蓋安史亂後所建歟？非龍興寺之本名也。

聖興寺 在府城之東偏，杜鳴漸更名永泰。唐末蓋復舊名。^[1]

[1] 嘉慶《四川通志》三八《寺觀目》，成都聖興寺，唐建，今廢。引宋李大臨《記》，在成都府城之東偏，大曆中，杜鳴漸改爲永泰寺。然《名畫錄》三見聖興寺之名，又《茅亭客話》三淘沙子條，蜀有此寺，蓋大中以後復舊名。

福感寺 在府城西郭下，一名大石寺，爲唐初以來之名寺，高僧駐錫者甚多。〔1〕

[1] 道宣《神州塔寺三寶感通錄》卷上，益州郭下福感寺塔者，在州郭下城西，本名大石。又《續高僧傳》一四有《唐益州福感寺釋道基傳》，卷二〇《唐益州空慧寺釋慧熙傳》有成都大石寺，卷二九有《唐益州福感寺釋道積傳》，《宋高僧傳》二三有《唐成都福感寺定蘭傳》，卷二七有《唐成都福感寺定光傳》，云即大石寺。是自唐初以來有福感寺且多高僧駐錫也。惟《大正藏》本《續傳》之《道基傳》作福成寺。注云一作感，一作宮。疑有譌。然成都城西誠有福成寺，未知是否爲一寺耳，姑兩存之。

資福寺 長慶二年段文昌所置，初名資福院。〔1〕

[1] 李德裕有《丞相鄒平公新置資福院記》（全唐文七〇八），以長慶二年十月二十三日作。按此碑見《寶刻類編》五。鄒平公爲段文昌。文昌以長慶元年授西川節度使，三年卸。

應天寺 以三絕著名。〔1〕

[1] 《名畫錄》評畫家逸格僅一人，即孫位，存繪壁在此寺及昭覺寺。孫於此寺寺門東畔畫東方天王及部從兩堵。其後前蜀景朴於寺門西畔畫西方天王及部從以相對，惟不逮孫筆遠甚。而《圖畫見聞誌》卷六《應天三絕》條云，渤海作長歌，僧夢歸書爲畫壁，「成都人號爲應天三絕。」蓋朴筆雖遜，亦得相攜並顯也。

金華寺 本唐前古寺，在城西四里，市橋西，笮橋北之相如琴台，與福感寺相近。天寶之前已廢，唐末復見置。〔1〕

[1] 《寰宇記》七二益州成都縣：「相如宅在川西四里。《蜀記》云相如宅在市橋西，即文君當爐滌器處。又《益部耆舊傳》云，宅在少城中（？）笮橋下（據蜀中廣記，下當作北。）有百許步。又有琴台在焉，今爲金花等寺。」此即《名畫錄》所見之金華寺也。《蜀中廣記》二述成都西門之勝有琴台。又云：「《方輿勝覽》云，琴臺後爲金花寺，城內者非其舊也。金花寺以晉胡僧持金花玉像住此故名，按即今之金泉鋪矣。」考《宋高僧傳》二七《唐成都福感寺定光傳》，福感寺舍利塔本在寺西北（又云西南）四十步，天寶末章仇兼瓊移至東北四十二步。云即金華舊寺基。則金華寺與福感寺相近，誠在城西。然此云金華舊寺基，則天寶時此寺已廢。蓋其後或大中以後復置此寺耳。

其餘四天王、寧蜀、翠微三寺及福慶禪院別無可考。然《名畫錄》所記十七寺院之外，仍有可考見者：曰法成寺〔1〕。曰法聚寺〔2〕。曰福勝寺〔3〕。曰多寶寺〔4〕。曰淨德寺〔5〕。曰福化寺〔6〕。曰招提寺〔7〕。曰大雲寺〔8〕。曰菩提寺，在城南二江合流處，殆與合江亭相近，至德二年建〔9〕。曰寧國寺，與菩提寺同時建〔10〕。曰武擔山寺，在府治西北一百二十步武擔山〔11〕。曰開元寺，開元二十六年建，孟蜀改名延福院〔12〕。曰寶相寺〔13〕。曰義善寺〔14〕。曰寶園寺，貞元十八年建〔15〕。曰南平寺，元和二年建〔16〕。曰寶刹寺〔17〕。曰慈恩寺〔18〕。曰福成寺，在城西石筍街之北〔19〕。曰法雲寺〔20〕。曰國清寺，在東市〔21〕。曰妙積寺〔22〕。曰鳴鶯寺〔23〕。曰延壽寺〔24〕。曰法華寺〔25〕。曰龍華寺〔26〕。



曰東禪院^[27]。曰天王院^[28]。曰松溪院^[29]。曰曹溪六祖禪院^[30]。曰大悲院^[31]。曰普福禪院^[32]。曰洪壽禪師院^[33]。曰毘盧院^[34]。凡三十四寺院^[35]。並前考見於《名畫錄》者，共凡五十二寺院。惟院可能有隸於寺者，亦可能有同為一寺院而前後異名者，不能詳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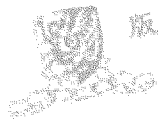
- [1] 道宣《神州塔寺三寶感通錄》卷上有益州法成寺。
- [2] 同前有益州法聚寺，為仁壽元年立舍利塔之一。又見《續高僧傳》二二《唐益州龍居寺釋惠詵傳》及同書二七《益州長陽山釋法進傳》。又《宋高僧傳》二一有《唐成都府法聚寺法江傳》，卷二九有《唐成都府法聚寺員相傳》。則此寺在唐代當頗有地位。
- [3] 《續高僧傳》二四（中華藏）《隋益州孝愛寺釋智炫傳》，本名孝愛寺，大業中改為福勝寺。按《益州名畫錄》下附載《胡氏亭畫記》，福勝祠有展氏子虔繪天樂二十五身，會昌毀佛，胡氏惜此畫之廢，剝而陷于茅亭之壁。而郭若虛《圖畫見聞誌》五作福聖寺。疑即智炫所居者歟？
- [4] 《續高僧傳》二五有《唐益州多寶寺猷禪師傳》，《宋高僧傳》二有《唐益州多寶寺道因傳》。
- [5] 《續高僧傳》二七《益州富上傳》有益州淨德寺。按《圖畫見聞誌》五《會昌廢壁條》，有成都靜德精舍，即此。
- [6] 《續僧傳》二七有《唐益州福化寺釋慧聰傳》。
- [7] 《宋僧傳》一有《隋益州招提寺釋慧恭傳》，度唐初必有此寺。
- [8] 《宋僧傳》一九《唐西域釋安靜傳》有成都府大雲寺徐果師。
- [9] 《宋僧傳》一九《唐成都淨衆寺無相傳》，「勸檀越造淨衆、大慈、菩提、寧國等寺。」按段文昌有《菩提寺置立記》（全唐文六一七）云：「蜀城正南當二江合流之上，萬井聯甍之內，獨有岡阜，迴抱數里，……以氣象言之，不有舍利梵宇，孰能主其勝勢乎？天寶末，元宗巡狩此方，崇護法教，度僧建寺，大啓休福。至德二年，長史盧公元裕奏置此寺，以菩提為號。」（按《寶刻類編》五有此碑，以長慶二年立。）先謀擇地於草堂寺無相大師，故《續傳》以為無相勸造也。地在城南，當二江合流之上，有岡阜處，正即合江亭所在。
- [10] 寧國寺惟見注^[9]引《淨衆寺無相傳》，別無可考。
- [11] 王勃有《晚秋遊武擔山寺序》（全唐文一八一），段文昌有《題武擔寺西臺詩》，姚向有《和段相公登武擔寺西臺詩》（全唐詩五函九冊）。按《寰宇記》七二益州成都縣，「武擔山在府西北一百二十步，一名武都山。」《蜀中廣記》三，成都北門之勝有武擔山，引唐人詩甚多。
- [12] 《四川通志》三八《寺觀目》，覺城禪院，即開元寺，玄宗開元中建，孟蜀廣政中改名延福院。詳所引宋王曙《記》。按《佛祖統紀》四〇，開元「二十六年勅天下諸郡立龍興、開元二寺。」二十七年，「勅天下僧道，遇國忌於龍興寺行嚴散齋，千秋節祝壽就開元寺。」成都開元寺即其一也。
- [13] 《寶刻類編》三，成都有《寶相寺釋迦像碑》，陳子傑撰，開元十二年。又有《寶相寺諸佛應化碑》，周顯撰，開元十五年八月十九日。
- [14] 《寶刻類編》四，成都有《義善寺法順和尚北塔記》，高郢撰，貞元十九年立。
- [15] 韋阜有《寶園寺傳授毗尼新疏記》（全唐文四五三），以貞元十八年十一月一日建。《寶刻類編》四收有此碑，謬作寶國寺。同書五又有《寶園寺故臨壇大德智泐律師碑》，段文昌撰，元和九年立。據此兩碑，此寺為律宗壇場。
- [16] 《唐會要》四八《寺目》：「元和二年九月勅，成都府宜置聖壽、南平二佛寺。」按其時

平劉闢之亂。

- [17] 《寶刻類編》四，成都有《寶刹寺佛頂尊勝陀羅尼經石柱》，元長楚撰，元和三年立。
- [18] 同上，成都有《慈恩寺焚夾經記》，武廷秀撰，元和八年立。
- [19] 劉禹錫《成都府新修福成寺記》（《全唐文六〇六》）云：「益城右門大遠坦然西馳曰石筍街，街之北有仁祠，形焉直啓，曰福成寺。寺之殿台與城之樓交錯相輝，繡於碧霄，望之如崑閩間物。大和四年……南詔君長……乘隙……門於城下，或縱火以駭衆，此寺乃焚。」後二年段文昌復修福成寺。是在城西石筍街之北，與城樓相接近。按杜翁《石筍行》，「君不見益州城西門，陌上石筍雙高蹲（陌一作街）。」（詳注一〇）與此記方位可相印證。
- [20] 花蕊夫人《宮詞》：「法雲寺裏中元節，又是官家誕降辰。」（《全唐詩十一函十冊》）
- [21] 《茅亭客話》三淘沙子條，見有東市國清寺，時在後蜀。
- [22] 妙積寺，見段成式《寺塔記》卷下保壽寺條。
- [23] 《寶刻類編》七，成都有《鳴鸞寺藏經堂碑》，前蜀永平二年四月三日。
- [24] 《寶刻類編》七，成都有《唐延壽北禪院碑》，僧思益撰，長興元年八月十七日建。延壽當爲寺名。
- [25] 《寶刻類編》八，成都有《千部法華寺經院記》，僧克言撰，後蜀廣政二十二年。
- [26] 《蜀檮杌》上，前蜀王建遊龍華禪院，召貫休誦詩。又《寶刻類編》八，成都有《龍華寺東禪院記》，王中孚撰，後蜀廣政二十三年四月立。蓋先爲院，後升寺歟？按《四川通志》三八《寺觀目》，龍華寺，唐建，後更名金繩院，詳所引宋楊億《金繩禪院記》。
- [27] 《宋僧傳》三〇有《梁成都府東禪院貫休傳》。疑此即龍華寺之東禪院。
- [28] 《寶刻類編》八，成都有《天王院功德碑銘》，任道伸撰，太和八年立。疑此院與《名畫錄》之四天王寺有關。
- [29] 《寶刻類編》六，成都有《松溪院記》，劉彖撰，大中四年六月記。同書八又有《松溪院正誥和尚道業記》虛撰，光化元年。
- [30] 同上，成都有《新修曹溪六祖禪院記》，秦韜玉撰，中和四年十一月。
- [31] 同上八，成都有《大悲院說戒堂記》，僧克信撰，廣政四年立。
- [32] 同上七，成都有《新創普福禪院記》，約廣政初。
- [33] 同上七，成都有《新創洪壽禪院記》，林念撰，廣政二十四年立。
- [34] 《四川通志》三八《寺觀目》有毘盧院，蜀王處回捨宅建，宋改爲嘉祐禪院。詳其所引宋人馮京《記》。
- [35] 此述諸寺院係非常粗畧的搜考。即就《續僧傳》與《宋僧傳》而言，主要只就傳主標題所見者；若細檢全文，必仍可增若干寺院。

道觀之可考見於《益州名畫錄》者，有龍興觀、興聖觀、天長觀、嚴君平觀、上清宮、龍虎宮、玉局化。^[1]興聖觀本名貞元觀、紫極宮，至德中更名。在東城，屬左街。^[2]嚴君平觀即嚴真觀，在小西門（延秋門）內。^[3]玉局化即玉局觀，在城南柳堤，爲道教之一勝地。^[4]其他觀名之可考者有青羊宮，在城西青羊肆，本名元中觀，僖宗更名。^[5]有至真觀，在城北十五里學射山。^[6]有福唐觀，玄宗幸蜀置。^[7]有乘燕、貞移、乘煙三觀；乘煙觀在府西南二里，本武侯宅。^[8]有大道觀，^[9]千秋觀，^[10]天師觀，^[11]玉華宮，^[12]太清觀，^[13]又或有仙居、鴻都、都慶三觀。^[14]共二十一宮觀，亦可能有一宮觀而前後異名者。

[1] 龍興觀四見，玉局化二見，餘皆一見而已。故成都道觀之盛遠不能與佛寺比。其龍興觀屢



- 見於杜光庭《文集》，蓋最有名，故《名畫錄》最多見。檢《寶刻類編》七，成都有《重修龍興觀記》，龐延翰撰，前蜀天光元年立。
- [2] 見杜光庭《謝恩賜興聖觀宏一大師張潛修造表》(全唐文九二九)，云「左街興聖觀」，又云：「前臨廣陌，東距錦江，宛是靈墟，實惟勝所，……乃皇都之福地。今則重加繕飾，盡撤輦暉。」此當在東城。「東距錦江」者，高駢已引郫江流經城東，故亦得有錦江之名也。(今錦江樓，即在城東南。)否則觀在城東南城外，合江亭上下，故亦云東距錦江，可屬左街也。若如此，亦見合江亭地區之為鬧區，故云輦暉。
- [3] 《茅亭客話》五《白蝦蟆條》。
- [4] 《寰宇記》七二，成都「玉局壇在城南柳堤玉局觀內。」(《蜀中廣記》三引作城北。)杜光庭有《上元玉局化衆修黃籙齋祠》(全唐文九三五)，《蜀王玉局化醮詞》，(同上九三九)為道教之一勝地，詳《蜀中廣記》三。
- [5] 僖宗《改元中觀為青羊宮詔》(全唐文八七)。按此詔見於杜光庭《歷代崇道記》(全唐文九三三)。詔云宮在青羊肆，有田二頃，散屬黎甿。在肆中，當近城。而《一統志》成都府卷《寺觀目》引《明統志》，宮在府西南十里，明初蜀王重建。蓋有遷移歟？《寶刻類編》七有《青羊宮碑》，樂龜朋撰，後蜀廣政七年立，在成都。
- [6] 《四川通志》三八《寺觀目》，至真觀在學射山，隋開皇中建；或云後周建。今廢。附引隋辛德源《記》。檢《寶刻類編》八成都有《至真觀主黎尊師碑》，盧子年撰，儀鳳二年正月十五樹。按《茅亭客話》五鮮于耆宿條，學射山上有至真觀，三月三日蠶市。《雲笈七籤》一一二《神仙感遇傳》作通真觀。蓋前後異名。在城北十五里，見《一統志》成都府卷《寺觀目》。
- [7] 天寶十五載，玄宗幸蜀，於成都置此觀，見杜光庭《歷代崇道記》(全唐文九三三)。光庭又有《題福唐觀詩》二首(全唐詩十二函六冊)，觀在山上。
- [8] 此三觀，皆見《寰宇記》七二益州成都縣條。「府西南」本作「府西北」，據《蜀中廣記》一述南門之勝引《方輿勝覽》改訂。
- [9] 《寶刻類編》二，成都有《大道觀記碑》東方謬撰，咸亨五年立。
- [10] 同上三，成都有《千秋觀碑》，李邕撰，開元二十六年七月立。
- [11] 同上四，成都有《天師觀修功德記》，王多元撰，貞元十二年立。
- [12] 同上七，成都有《重修玉華宮仙碑》，楊德輝撰，前蜀乾德四年立。
- [13] 同上七，成都有《太清觀取鐘并修觀記》，杜光庭，後唐天成二年立。
- [14] 杜光庭有題此三觀詩各一首，(全唐詩十二函六冊)。《四川通志》三八《寺觀目》據三詩，列入成都。然仙居山觀屢見於杜光庭《文集》。其《皇帝醮仙居山詞》(全唐文九四一)云，「漢州什邡縣百姓郭迴芝於仙居觀採藥。」則似在漢州，不在成都附近。姑存之。

成都佛道兩教皆盛。佛教之盛；觀前述寺院之興建可證，如大慈寺規模之宏大，淨衆寺在禪宗史上之特殊地位，以及各寺院之繪事與雕刻，皆顯見佛教之興隆。再就高僧駐錫之分佈地言之，山崎宏據《續僧傳》與《宋僧傳》統計，隋唐時代，益州高僧二十八人，僅次於長安與洛陽，他州皆不及。〔1〕此亦見其盛。成都佛教興隆，人文又盛，其藏經當亦較豐，故川外僧侶有「齋錢帛詣西川寫藏經」者。〔2〕道觀可考者雖較少，然西川久為道教之一中心，神仙之說最為流行，至謂「成都乃神仙所聚之處」。〔3〕至北宋初年，史稱「道教之行，時罕習尚；惟江西、劍南，人素崇重。」〔4〕此即承唐五代之風習也。

- [1] 山崎宏《支那中世佛教之展開》第一部第七章《隋唐時代佛教教線之發展》。
- [2] 《太平廣記》一一六僧義孚條：「義孚……寓於江陵龍興寺，行止詭譎，府主……俾齎錢帛詣西川寫藏經，或有人偷竊社戶所造藏經出貨，義孚以廉價贖之，其羨財遂為所有。」賣經者及此僧皆得惡報，「同寺有數輩販鬻經像，懼而捨財，修功德。」（出《冥報錄》）
- [3] 《太平廣記》八五擊竹子條：「成都酒神仙所聚之處，如擊竹子者亦以多矣。（出野人閑話）」又卷三一許老翁條，「章仇意疑仙者往來必在藥肆，（出《玄怪錄》）」
- [4] 《續資治通鑑長編》七二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十月甲午條。

七、文學藝術與民風

地方民風，在生活、文化各方面皆足表現。前述成都寺觀佛道，已見宗教氣氛之濃厚；前述四季市集，官民乘時遨遊，已見蜀民蕩於逸樂。今當續就文學、藝術、酒色風流諸事畧述之。

胡三省曰：「自漢司馬相如、揚雄以來，蜀號多士。」^[1]此不待言。唐代蜀中人文之盛，只觀第五節論印刷工業，已足測知。蓋印刷工業之興起，諸經石刻與雕板印行，固有利於文化之發展，而實亦藉人文蔚盛為背景也。惟唐人籍貫，多舉郡望，實籍難徵，故難仔細作統計，以定諸方之優劣耳。至唐末五代，郡望之意義漸失，籍居轉多可信。王士禎云：「十國文物，首推南唐、西蜀。」^[2]余嘗就《五代詩話補本》作統計，此語誠然。^[3]此見蜀中詩風之盛。次言詞。詞興於中晚唐，至五代而成熟。此種文學作品，論體裁與管絃聲樂有密切關係；論內容，又以商業繁榮之都市生活為背景。唐末五代之詞作家，亦大抵以南唐與西蜀為多，論最高成就，固當推南唐李後主，但人才之衆，詞風之盛，恐當轉推西蜀，此趙崇祚所以有《花間集》之編集也。《花間》十八家中，除極少數之外，多為蜀人或流寓蜀中、仕於兩蜀者。其作品，除少數作家之外，大抵以豔麗辭句，作色情描繪，不免流於淫蕩。^[4]下文論成都當時管絃樂舞之盛與都市生活之奢靡，固當有此種文藝作品之產生也。

[1] 《通鑑》二九一後周廣順三年紀，胡《注》。

[2] 王氏《五代詩話·例言》。又其《漁陽詩話》卷中：「五代時，吳越文物不及南唐、西蜀之盛。」

[3] 拙作《五代十國人文地理》（中國歷史地理第二冊，中華文化事業出版委員會。）曾據此書統計各地區詩人，中朝六十五、南唐七十三、西蜀五十一、楚三十九、閩十七、吳越十三、荆南四、南漢三、北漢則無。（王室及女子僧道未計）中朝地理面積與南方諸國之總面積畧相等。

[4] 此段參看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中卷第十七章。

次言藝術，如繪畫，杜詩所見已不少。蓋其時畫師多流寓者。^[1]宋人李石詩云：「成都名畫窟，所至妙宮牆，風流五代餘，軌躅參隋唐。」又李之純云：「舉天下言唐畫者，莫如成都之多。」^[2]故黃休復有《益州名畫錄》之作。據稱「會昌前諸寺圖畫亦多除毀。」然仍述名畫為書三卷，凡五十八人。就中成都一縣幾居四分之一，連近區

蜀人，幾佔三分之二，餘皆留寓成都者。^[3]蜀畫之名遠播，是以荆、湘、淮、浙之商賈以爲奇貨，爭致之。^[4]故謂成都爲唐末五代全國繪事之中心可也。^[5]雖南唐亦不能及。^[6]

[1] 杜翁寓成都及梓、閬間，多題畫之作。收於《杜詩詳注》卷九至卷十四。如《題壁上韋僊馬歌》、《題王宰畫山水圖歌》、《戲爲韋僊雙松圖歌》、《嚴公廳宴詠蜀道畫圖》、《姜楚公畫角鷹歌》、《觀薛少保書畫壁》、《通泉縣署薛少保畫鶴》、《丹青引贈曹將軍霸》、《韋諷宅觀畫馬圖》、《嚴鄭公廳事岷山沱江圖》、《觀李固弟山水圖》，蓋多畫師流寓蜀中之畫筆也。

[2] 李石《《府學十詠》之五《禮殿音書》，收入《成都文類》卷四。李之純《大聖慈寺畫記》，收入《成都文類》卷四五。

[3] 「會昌前」一句，見其所著《名畫錄》卷上李洪度條。又其盧楞伽條云：「蜀中諸寺佛像甚多，會昌年皆盡毀。」亦兼指畫而言。李改爲作《序》，稱其所錄「自李唐乾元初至皇宋乾德歲」，則皆唐後期及五代時畫家繪事也。今據此《錄》作統計，畫師五十八人，計其籍貫，成都十二，華陽一，蜀人十，簡州三，蜀州五，眉、漢、邛州各一，左蜀一，是成都華陽幾佔全部人數四之一，成都及其附近人數幾佔全數三之二，餘爲非蜀人而留寓者。足見成都繪事之盛。又郭若虛《圖畫見聞誌》卷二《記藝》上，錄唐末畫家二十七人，五代畫家九十一。唐末二十七人中，成都人四，蜀人在成都者三，長安人在成都者二，不知籍而在成都者十，共計在成都者十九人，踰全國總數三分之二。五代九十一人中，成都人十一，華陽人一，蜀人在成都者六，蜀人八，外籍而居成都者五，共計三十一人，亦踰全國總數三分之一。郭《誌》爲傳世材料所限，取材不無所偏，（益州有《名畫錄》可取，他州無此類書傳世。）然仍見蜀中成都繪事之盛。黃休復又有《茅亭客話》十卷專記蜀中故事，亦有繪畫事多條。又《吳船錄》卷上，記峨眉牛心寺云：「寺有唐畫羅漢一板，筆跡絕妙，眉目津津，欲與人語。成都古畫浮屠像衆多，以余所見，皆出此下。蜀畫胡僧惟盧楞迦之筆爲第一。今見此板，乃知楞迦源流所自。」此亦成都壁畫之盛之證。

[4] 《益州名畫錄》卷上張南本條云：

「府主陳太師於寶曆寺置水陸院，請南本畫天神地祇三官五帝，雷公電母，岳瀆神仙，自古帝王，蜀中諸廟一百二十餘幀，千怪萬異……錯雜其間，時大手筆也。至孟蜀時，被人模塌，竊換真本，鬻與荆湖人去，今所存爲本耳。」

又卷中張玄條云：

「攻畫人物，尤善羅漢。當王氏偏霸，武成年，聲跡喧然，時呼玄爲羅漢。荆、湖、淮、浙令人入蜀縱價收市，將歸本道。」

同卷李文才條云：

「蜀廣政中，荆南高太王令邸務丁晏入蜀，請文才寫興義門兩雙石笋，兼徵其故實，將歸本道。」

同卷杜敬安條云：

「妙於佛像，……蜀偏霸時，江、吳商賈入蜀，多請其畫，將歸本道。」

同卷阮惟德條云：

「畫當時宮苑、亭台花木、皇妃帝后富貴之事，精妙頗甚。……蜀廣政初，荆、湖商賈入蜀，竟請惟德畫川樣美人卷簇，將歸本道，以爲奇物。」

足見當時蜀川以外，亦貴重成都畫術，故商賈競求蜀人畫幅以爲商貨也。又卷中黃居寀條云：

「淮南通好之日，居寀與父同手畫《四時花雀圖》、《青城山圖》、《峨眉山圖》、

《春山圖》、《秋山圖》，用答國信。」

此亦正見蜀畫之為四方所重，故蜀主以為國信。

[5] 參看注[3]就郭若虛《圖畫見聞誌》所作統計。

[6] 參看俞劍華《中國繪畫史》上册第十章《五代之繪畫》(商務印書館出版)及《中國壁畫》第三編《歷代寺觀壁畫》第三節《五代的寺觀壁畫》。(中國古典藝術出版社出版)

成都之另一藝事，為管絃妓樂之盛。按自南朝以來，蜀聲即與吳聲並著。隋唐之際，知音人趙師曰：「吳聲清宛，若長江廣流，緜緜徐逝，有國士之風；蜀聲躁急，若擊浪奔雷，亦一時俟決也。」^[1]此見其音色。唐代前期，承平百餘年，絲管音樂勢必增盛。杜翁始到成都，第一詩《成都府》即云：「喧然名都會，吹簫聞笙簧。」^[2]其後《贈花卿》云：「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此曲祇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3]雖屬諷詞，亦是寫實。蓋其「風土愛彈琴」^[4]「管絃歌舞之多」猶在揚州之上。^[5]至五代時期，管絃聲樂更盛，至「村落閭巷之間，絃管歌聲，合筵社會，晝夜相接。」^[6]故製琴工業技術亦優，殆為四方之最。^[7]而蜀之妓樂亦為中原所不逮。^[8]按蜀中文風自昔為盛，加以繪事、音樂、歌舞，兼且縱酒風流，此所以有薛濤其人，為千古傳揚之名妓；宋真宗至稱「蜀婦人多才慧」欲求一蜀姬也。^[9]

[1] 《御覽》五七九引《唐書·樂志》：「趙師……天水人也，在隋為知音。至唐貞觀初，獨步上京。……師云，吳聲清宛」云云。

[2] 《杜詩詳注》九。就今存詩集言，此為到成都之第一首詩。蓋長安亂後，久不見都市繁榮；初至成都，不禁為成都之盛況所震撼也。

[3] 《杜詩詳注》一〇。

[4] 徐晶《送友人尉蜀中》詩(全唐詩二函二冊)有此句，而張蠙亦有此詩(全唐詩十函十冊)。按晶在開元天寶間，蠙為乾寧進士，未知果誰所作。

[5] 盧求《成都記序》(全唐文七四四)本文第一節已詳引。

[6] 見《蜀橋記》卷下，後蜀廣政十三年條。又宋史二五七《吳廷祚傳》，子元載知成都府，「蜀俗奢侈，好遊蕩，民無贏餘，悉市酒肉為聲技樂。」是其餘風。按其實，成都此風，自《漢地志》所載迄今，風習大抵不殊。

[7] 《茅亭客話》一〇黃處士條：「黃處士名延矩，……眉陽人也。……常言家習正聲，自唐以來，待詔金門。父隨僖宗入蜀，至某四世矣。琴最盛於蜀，製斲者數家，惟雷氏而已。又云雷氏之琴不必盡善，有瑟瑟徽者為上，金玉者為次，螺蚌者亦又次焉。」按雷氏琴唐中葉已知名。《唐國史補》卷下云：「蜀中雷氏斲琴，常自品第，第一者以玉徽，次者以瑟瑟徽，又次者以金徽，又次者螺蚌之徽。」次第小異。

[8] 《舊五代史》七三《毛璋傳》，後唐使繼岌平蜀，璋功居多。及蕭牆禍起，繼岌回至渭南，「部下散亡，其川貨妓樂，為璋所掠。……璋既家富於財，有蜀之妓樂，驕僭自大，動多不法。」足見蜀之妓樂，非中原能比。

[9] 《涑水紀聞》五，真宗為太子時，謂蜀人宮美曰，「蜀婦人多材慧，汝為我求一蜀姬。」亦足見當時蜀女之名動中原。故張詠二月二日踏青節詩云：「春游千萬家，美人顏如花，三三兩兩映花立，飄飄似欲乘烟霞。」(《學海類編·集餘》八費著《成都遊宴記》)

又蜀俗好飲酒，故成都春酒相當有名，^[1]杜翁至云「蜀酒濃無敵」。^[2]且「士

子莫不酤酒，慕相如滌器之風也。」〔3〕酒樓亦多，「皆以當壚者名其酒肆」，酒食之外，兼供宿客。〔4〕此蓋商業發達、冶遊亦盛之都市之必然產物。

〔1〕岑參《酬成少尹駱谷行見呈》詩云：「成都春酒香，且用俸錢沽。」（全唐詩三函八冊岑集一）

〔2〕杜翁《戲題寄上漢中王詩》（詳注一一）有此句。又《將赴成都草堂先寄嚴鄭公詩》云：「酒憶鄆筒不用酤。」（詳注一三，有注。）

〔3〕《北夢瑣言》三。

〔4〕《茅亭客話》四王太廟條：「偽蜀成都南米市橋有柳條家酒肆。其時皆以當壚者名其酒肆。柳條明悟，人多狎之。」按同卷史見魂條，東市南有勾氏家酒肆。又《太平廣記》八五擊竹子條，在成都酒肆中。韋莊《傷灼灼》詩《本注》：「灼灼，蜀中之麗人也，近聞貧且老，殂落于成都酒市中。」（全唐詩十函九冊韋集六）。張籍《成都曲》：「萬里橋邊多酒家，遊人愛向誰家宿。」（全唐詩六函六冊張集一）。具見成都酒樓之多，且供遊人寓宿，不專酒食而已。

北宋張詠《悼蜀詩》述王小波亂前西蜀之繁侈云：

「蜀國富且庶，風俗務浮薄，奢僭極珠貝，狂佚務娛樂，虹橋吐飛泉，煙柳閉朱閣，燭影逐星沉，歌聲和日落，鬥雞破百萬，呼盧縱大噓，遊女白玉璫，驕馬黃金絡，酒肆夜不扃，花市春慚作，禾稼暮雲連，紈繡淑風錯。」〔1〕

按此為宋初三十餘年間成都繁侈之景況也，顯承唐末五代之遺風；取與前文比觀，即視為唐末五代成都社會民風之總寫照可也。復考《漢書·地理志》云，蜀「俗不愁苦，而輕易淫泆。」《隋書·地理志》亦云，蜀人「敏慧輕急」，「頗慕文學，時有斐然」，「多溺於逸樂，少從宦之士。」〔2〕蓋蜀地物資豐富，不待勤勞而足衣食，氣候溫和，乏天然之刺激，故其人習於享樂，流於侈靡，不積極於事功，其所從來久矣。

〔1〕《悼蜀詩》收入《成都文類》卷二。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2〕《宋史》二九三《張詠傳》亦云：「蜀士知向學，而不樂仕宦。」又見范鎮《東齋記事》卷四。

八 都市戶口數額畧測

正史地志所記戶口，只是戶籍簿中著籍數字，實際戶口通常都遠在戶籍數目之上。蓋除百姓為避賦役而逃脫之外，合法之不入戶籍者亦極衆多，如官戶、商賈、僧道、奴婢等，皆不在籍中。〔1〕成都實際人口，在盛唐時代，當近十萬戶四五十萬人。〔2〕唐末五代時期，實際戶口必更多，粗畧估計，當有二十萬戶一百萬口以上。〔3〕就其分佈而言，唐代初年，城西北或較稠密。〔4〕自唐中葉以後其闊區似在城南，城南八里大江上萬里橋邊尤多酒家，〔5〕橋東至合江亭間，亦萬井聯甍，〔6〕皆城南人口密集之徵。

〔1〕另詳《唐代人口踰億說》，未定稿。

〔2〕杜翁《水檻遣興》：「城中十萬戶，此地兩三家。」（詳注一〇）此雖詩句，但杜翁歌詠城市戶口或云十萬，或云九萬，頗有分寸，蓋成都民戶實近十萬。惟或包括近郭而言耳。薛濤《上王尚書》詩云：「十萬人家春日長」（全唐詩十一函十冊）蓋亦此意。又李景讓有「成都十萬戶，拋若一鴻毛。」（全唐詩九函三冊李集引北夢瑣言）按景讓以大中末為西川節

度，蓋已成定型之詩句矣。檢《元和志》三一成都府，開元二十一年置劍南節度使，其團結營在「蜀郡城內，管兵一萬四千人，馬一千八百匹。」城內駐軍一萬四千人之多，加以家眷戶口，恐亦非大量民戶工商業者不能供給也。

- [3] 高駢《請築羅城表》（全唐文八〇二）云：「自咸通十年以後，兩遭蠻寇攻圍，數萬戶人填咽共處，池泉皆竭，熱氣相蒸，其苦可哀。」只云數萬人。然此明指城牆之內而言。其時舊城甚小，故只數萬戶。亦可能僅指戶籍而言。高駢大築羅城四十餘里，民戶必大有增加。五代時期，聚居民戶尤多，《太平廣記》二四一王承休條，蒲禹卿諫王衍曰：

「陛下莫見居人稠疊，謂言京華繁華。蓋是外處殘廢，住止不得，所以競來臻湊，貴且儉安。」

又《蜀橋樑》上，前蜀王衍乾德五年條云：

「四月，遊浣花溪，龍舟綵舫，十里綿互，自百花潭至萬里橋，遊人士女，珠翠夾岸。日正午，暴風起……溺者數千人。」

同書卷下後蜀孟昶廣政十二年條云：

「八月，昶游浣花溪。是時蜀中百姓富庶，夾江皆植亭榭；游賞之處，都人士女傾城游玩，珠翠綺羅，名花異草，馥香森列。昶御龍舟觀水嬉，上下十里，人望之如神仙之境。昶曰曲江金殿鎖千門，殊未及此。」

同上十五年條云：

「六月朔……天地昏暗，大雨雹。明日，……大水漂城，壞延秋門，深丈餘，溺數千家。」此四條皆見五代時期成都之繁榮，人口之衆多，當不只十萬戶。花蕊夫人《宮詞》云：

「月頭支給買花錢，滿殿宮人近數（一作「盡十」）千，遇着唱名多不語，含羞走過御床前。」（全唐詩十一函十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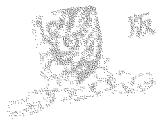
按宮人數千或近十千，想像宮庭男女人口至少在一萬以上至兩萬人，外加百官、軍隊。百官各有家屬，兵士宮人亦部分有家屬，消費人口之龐大如此，城內外工商業者必衆多，估計五代時期，成都實際人口當在二十萬戶，一百萬口以上。且《通鑑》二五三乾符五年紀，王仙芝，焚掠江陵，「江陵城下舊三十萬戶，至是死者什三四。」成都繁榮猶在江陵之上，知此項估計，只嫌保守，決非侈談也。

- [4] 續高僧二五《感通》篇中《釋富上傳》：「富上……恆依益州淨德寺宿。……有信心者曰，城西城北人稠施多。」（大正藏）。時在唐代初葉。

- [5] 張籍《成都曲》：「錦江近西煙水綠，新雨山頭荔枝熟，萬里橋邊多酒家，遊人愛向誰家宿。」（全唐詩六函六冊張集一）。按《華陽國志》三《蜀志》，「城南曰江橋，南渡流曰萬里橋。」（流下脫江字）。《元和志》三一成都府成都縣，「萬里橋架大江水，在縣南八里。」（寰宇記作二里；或就羅城而言歟？）又云「大江一名汶江，一名流江，經縣南七里。」又范成大《吳船錄》上，發成都日，「泊舟小東郭合江亭下，……其西則萬里橋。」蓋由城南出，先渡郫江曰江橋；再南渡大江（即流江）曰萬里橋也。張籍以貞元中登進士第，其時南城外八里之萬里橋邊多酒家，知城南爲鬧區。前考錦官城在縣南十里，北接夷里橋，東北接萬里橋。是萬里橋北接郡城，西南連錦城，東近兩江合流處舟車會聚之合江亭，宜其特見繁榮多酒家也。又按《元和志》所記，詳於城南，而畧於城北；上稽《華陽志》、《水經注》，亦有此傾向；且前考成都有東西南三市，而無北市，米市亦在南城，此亦城南繁榮之一徵。

- [6] 段文昌《菩提寺置立記》（全唐文六一七）：「蜀城正南當二江合流之上，萬井聯甍之內，獨有岡阜，迴抱數里，地形……高坦。」按二江合流即合江亭處，其上即合江亭西至萬里橋間之地段，是此地段人煙繁密。

一九八一年一月十八日初稿，二十七日增訂畢功。十一月九日校稿，並稍作修訂。關於胡注城郭三重問題，有幾條新錄史料，但恐增加排版困難，故未大更動。



附 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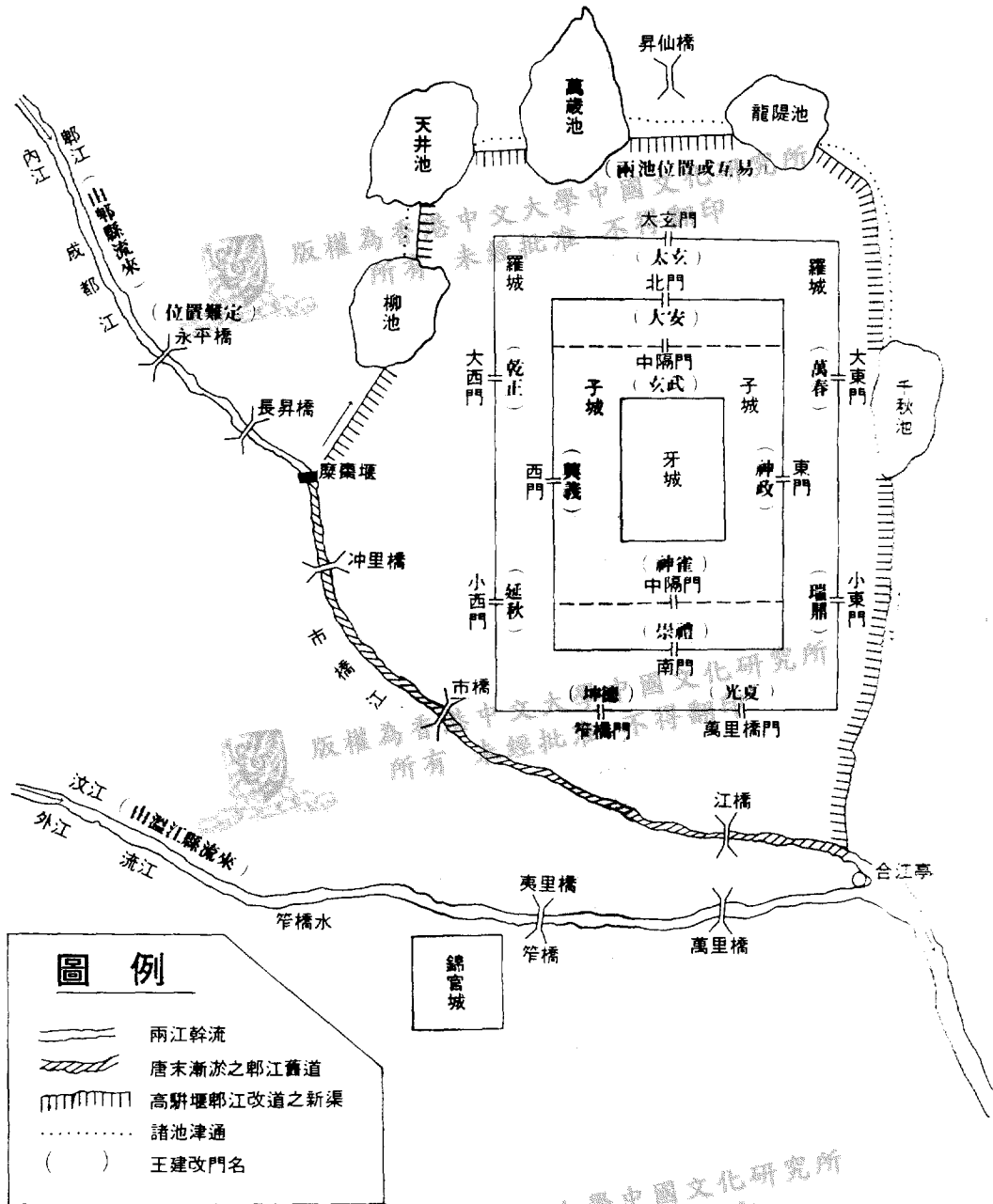
這是三十幾年前就開始搜集資料，而近兩三年來又擬放棄，但終於寫成了一篇論文。原來我早年計劃寫一部「唐代人文地理」，三十餘年來，為此項計劃花了很大工夫，遍搜有關資料；交通問題也是其中之一，但為特擬精細撰寫的一編而已。近數年來，深感漸入老境，而交通一書尚未完成，下面還有「唐代人文地理」與「國史人文地理」兩部大書要寫，實感已無法都能完成。朋友們或勸我先寫「國史人文地理」全書，立一大綱，對於後學益處較大，如余英時兄即屢示此意。我想這是一項很有意義的意見，但全史通論與唐代專題已不可能兼顧，所以兩三年前，頗有意放棄「唐代人文地理」的撰寫，只將歷年所搜錄交通問題以外的史料如國疆、軍鎮、人口、都市、物產、民族、宗教、民風等約近十萬條，分類編列，為一資料集，如顧氏《天下郡國利病書》，以便將來學人之取用。去年秋冬之際，擬利用晚上時間，開始此項工作。先提出都市編的成都資料，加以編排整理。但我一向做精細工作的習慣，也有毛病，看到問題，總想追求解決，發覺晚上在家短暫時間不夠，仍移到研究室作為一項正式工作來做，結果寫成這樣一篇論文。不過已比我做交通問題鬆懈多了。例如講唐代成都城郭及城外兩江問題，雖已糾正楊氏《水經注圖》之誤，但其實尚可進一步研究，也未找一張近代詳圖作參考；又如寺觀一目，亦不算完備。不過就大處看，已可謂為研究中古時代之成都的一篇重要論文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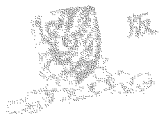
在這篇論文寫成之後，我的寫作計劃，又有一項大轉變，決心先寫「唐代人文地理」；至於「國史人文地理」一書，以後再說。因為唐代資料已搜集相當完備，成書極有把握。即如這篇論文，全憑手頭已錄資料寫成；臨時參考，也只限於自己收藏書刊，利用圖書館藏書之處極少。如此看來，雖然完全退休家居，工作進行仍無問題，必能順利完成這部計劃。至於「國史人文地理」，已有的成績，最主要的是歷年編寫講稿十八夾一百數十萬字及寫錄卡片（唐代除外）殆不逾兩萬張而已。此外歷年複印資料及搜購書刊雖大多為此項工作而準備，但尚待加功閱錄與擇採，想來就是盡有生之年，全力以赴，也無把握能寫得好。（太大的東西本不能奢望寫得如意。）故為穩健計，先寫專題，暫置此項通論工作，將來只將這批講稿加以整理，並作必要的補充，精粗雜陳，作為一種初步的未定稿保存而已。今後寫作計劃的這一項改變，實由此文寫作所促成，故附記於此。

一九八一年二月廿三日



唐五代成都城郭江流示意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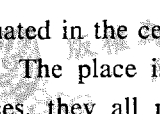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Ch'êng-tu in the T'ang and the Five Dynasties

(A Summary)

Yen Keng-wang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Ch'êng-tu is situated in the centre of the only vast plain in the extensive south-west region of China. The place is rich in products. All around the city are large regions with many races, they all rely on it as a collecting and distributing centre of goods and materials. Thus, Ch'êng-tu even since it appeared in history has been the political, military, communication, economic, as well as cultural centre in south-west China. In the later years of Western Han, Ch'êng-tu was one of the six largest cities in the country. From then on it was one of the few cities in the history of China whose prosperity was never interrupted.

Ch'ang-an, the capital in T'ang times, relied on Ch'êng-tu as its, repository in normal times. In times of emergency, Ch'êng-tu became the refuge to which the people could retreat and there make their temporary homes. This in turn added to its prosperity. Consequently, besides the capital Ch'ang-an, Ch'êng-tu and Yang-chou were the two largest cities in the middle period of the T'ang. In the late Tang and the Five dynasties, Ch'ang-an and Yang-chou were repeatedly devastated by wars. Moreover, the country was under several independent political authorities. Communication between north and south was hindered, and canals were wrecked, Yang-chou even lost its special position as a centre of communication. Nevertheless, Ch'êng-tu was still politically stable. Without the burden of supplying Ch'ang-an, it flourished as an economic centre. With the settlement of people from Kuan-chung there were further cultural developments in this period. Ch'êng-tu was thus unique in its prosperity in the whole of China, and reached its peak in its long history, Yet historians have paid little attention to the Ch'êng-tu of this period. This article gathers together a good deal of information, including information about the city walls, political, military and commercial conditions, population, literature and religion which confirms the importance of the city in the T'ang dynasty.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